魏晉十六國北朝墓出土陶瓷試探

謝明良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一、前言

或許是由於出土資料的限制，過去在討論漢至隋唐之間陶瓷發展時，較偏重於南方出土以浙江青瓷窯系爲主的作品，對於北方魏晉十六國北朝墓出土陶瓷則較少涉及。北方魏晉十六國是中國史上戰亂頻仍的時期，至北魏攻陷涼州統一北方結束十六國時代之後，王朝仍屢有更迭，至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楊堅廢北周建立隋朝，經歷了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等政權。正確地掌握北方這一期間出土陶瓷的具體面貌，不僅有利於今後以更健全的視野來觀察南方六朝陶瓷，其做爲隋唐陶瓷的主要淵源之一，亦與如何正確地評估隋唐陶瓷的工藝成就息息相關。

隨著中國方面考古發掘的開展，陸續公布了爲數可觀的北方出土陶瓷資料，並曾由矢部良明氏撰文進行考察，①給予筆者不少有益的啟發。矢部氏主要是以各紀年墓爲單位詳細討論了出土陶瓷諸狀況，本文則擬在廣泛佔有考古資料的基礎之上，嘗試以總結的敘述方式來構築該一時期陶瓷的整體發展變遷，從而彰顯其在陶瓷史上的位置及存在之諸多問題點。魏晉十六國北朝墓出土陶瓷以無釉的低溫陶器佔絕大多數，不過本文是以數量相對較少的鉛釉和青瓷等施釉陶瓷爲主要的考察對象，這是因爲筆者相信它們可以較清晰地反映北方窯業的發展趨向以及南北兩地交流等重要議題。

二、鉛陶釉的變遷

㈠魏晉十六國墓的鉛陶釉

截至目前，北京、河南、山東、陝西、遼寧、甘肅以及江蘇甚至雲南等省分或地區晉墓都曾出土鉛釉陶器。其中，北京景王墳第1、2號西晉墓出土了施罩青綠或青黃色釉

1. 矢部良明，＜北朝陶磁の研究＞，《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16號（1981），頁31～144。該文是筆者所知目前唯一夠份量的有關北朝陶瓷的專論。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的盤、樏、奩、勺、罐、扁壺、甑、灶、人俑和牛車等②（圖1）；同北京房山區小十三里西晉墓亦見有樏、羽觴、盤、尊、武士俑等釉陶器；③雲南大理西晉墓則出土了淺綠色釉的缽和碟；④陝西華陰縣報告書所推定的東晉墓也出土了表飾青釉內掛褐釉的井或倉等明器模型⑤（圖2～3）。雖然目前可確認的曹魏墓數量極少，亦不見該一時期墓葬出土鉛釉陶的正式發掘報導，⑥不過就華陰縣1號磚室墓的形制而言，係由方形前後室另前室南北二耳室所構成，其與經確認的曹魏墓如河南偃師1606號墓、⑦洛陽16工區正始八年（247年）曹芳墓、⑧甘肅嘉峪關新城1號甘露二年（257年）墓等基本一致。⑨其次，該墓伴出的陶長頸壺、三足圓腹樽、圓盤或釉陶罐等作品造型也與前述偃師杏園村1606號墓所出同類作品極爲相近。⑩因此，無論就墓葬構築或出土陶瓷而言，華陰縣1號墓的時代要上溯至三國時期。從而得知，鉛釉陶於曹魏時仍繼續生產，彌補了以往陶瓷史上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意義。此外，北京景王墳西晉墓出土的施釉陶人俑，則可修正部份研究者將該類陶俑的年代訂於北魏時期的錯誤看法。⑪

除了上述少數幾座魏晉墓之外，經報導的晉墓所出鉛釉作品，一律是通高在10公分以下，甚至高僅3公分的小罐。依據不同報告書對於該類小罐所描述的釉色，計有暗紅、肉紅、淡茶、黃褐、青醬、醬色和綠色等，而以所謂綠色釉最爲常見。從圖版觀察及筆者實見的個別作品推測，應以施單肉紅茶褐色系的綠釉或醬釉佔絕大多數，它們均屬低溫鉛釉陶。⑫晉墓的綠釉罐多爲每墓一件，只有少數墓葬出土兩件。幾乎可以說，該類造形奇小，數量有限的小罐是晉墓唯一可見的鉛釉陶器，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該類罐集中出土於北方地區墓葬，於北京順義縣大營村5號墓、⑬河南杏園村34號墓、⑭

2.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喻震)，＜北京西郊發現兩座西晉墓＞，《考古》，1994年4期，頁209～12。
3. 朱志剛，＜房山區小十三里村西晉墓＞，《中國考古學年鑑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頁124～25。
4. 大理市文管所（楊益清），＜大理市荷花寺村西晉墓清理簡報＞，《考古》，1989年8期，頁710～13轉735。
5. 夏振英，＜陝西華陰縣晉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4年3期，頁36～42轉48。
6. 唯一的例子，可能是近年北京大學考古系編《燕園聚珍》（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頁228圖119～20所載北京市海淀區八里莊曹魏墓出土的鉛黃釉樏和灶，但未見正式發掘報告。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趙芝荃等），＜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兩座魏晉墓＞，《考古》，1985年8期，頁721～35。
8. 李宗道等，＜洛陽16工區曹魏墓清理＞，《考古通訊》，1958年7期，頁51～53；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張劍等），＜洛陽曹魏正始八年墓發掘報告＞，《考古》，1989年4期，頁314～18轉313。
9. 嘉峪關市文物清理小組，＜嘉峪關漢畫磚墓＞，《文物》，1972年12期，頁24～41。另參見：徐殿魁，＜試述洛陽地區曹魏墓的分期問題＞，《中原文物》，1988年4期，頁30～33轉45。
1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趙芝荃等)，同註7，頁723圖二之3、4；圖三之6、8。
11. 如北京首都博物館的研究者即將該類釉陶俑的時代定於北魏。見《北京歷史文化展》（東京：讀賣新聞社，1989），圖15。
12. 發掘報告書中亦有將該類鉛釉罐誤認爲瓷器的情形。如揚州博物館（李則斌等），＜江蘇邗江甘泉六里東晉墓＞，《東南文化》，1988年3期，頁25圖三之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趙芝荃等），同註7，頁733圖二一之4。
13.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黃秀純等），＜北京市順義縣大營村西晉墓發掘報告＞，《文物》，1983年10期，頁66圖二二之3。

洛陽西郊3004號墓、⑮遼寧遼陽三道壕8號墓⑯（圖4～5）、瀋陽伯官屯5號墓、⑰朝陽十二台鄉3號墓、⑱山東蒼山縣墓⑲以及甘肅嘉峪關6號墓、⑳嘉峪關觀浦大隊9號、11號墓㉑（圖6）都曾出土。而以洛陽一帶最爲集中，如五十年代初期發掘洛陽五十四座晉墓時，多數墓葬都有出土㉒（圖7）。此外，北京石景山西晉永嘉元年（307年）墓出土的釉色、尺寸未經報導的施釉雙繫小罐，㉓估計也屬同類作品；南方地區目前只出土於江蘇省晉墓。

見於報導且刊載有圖版或實測圖的所謂綠釉小罐近二十件。就造型而言，可大致區分爲帶繫圓腹和無繫卷口斜腹等兩種罐式。帶繫罐一般呈直口或直口微侈，鼓肩、球腹、平底，並於肩部安置一對橫向或縱向的半環繫；個別作品如遼陽三道壕8號墓出土者，則於罐肩平折兩段形成段肩，肩以下斜直內收。也有於罐肩安四繫者，然較少見。無繫罐多小口外卷略呈唇口，細短頸、弧肩或折肩，肩以下內收成平底；少數作品呈撇口、束頸、斜肩、斜直腹或平口無頸。後者平口罐目前只見於嘉峪關觀浦大隊11號墓，㉔是否可能因口頸斷落所造成？由於報告書中並未提及，詳情不得而知。該類罐經常加飾幾道簡單的陰刻弦紋，帶繫罐的弦紋一般飾於繫耳上下方，無繫卷口罐弦紋分別飾於頸下近肩處和肩部以下。依據報告書的描述得知，器胎一般爲紅褐色調，少數作品呈灰色。絕大多數作品施釉均勻，施滿釉，並於器肩留下三處細小支釘痕，作工極爲講究。從筆者實見的該類罐口沿均有積釉情形不難推測，應係施滿釉後以支釘覆燒而成，其與漢代鉛釉器皿經常以覆燒技法燒製而成的作法有共通之處，但更爲精緻。

北方西晉以後墓葬，除了遼寧朝陽袁台子東晉壁畫墓曾經出土施單淺紅醬釉的碗、缽，以及報告書所稱瓷化程度較高的茶釉碗等作品㉕是否屬鉛釉陶不明之外，經確認的十六國時期墓葬，只有同省北燕太平七年（415年）馮素弗墓（M1）出土有黃綠色釉的淺盤口細頸球腹罐屬鉛釉陶器。㉖罐高三十餘公分，釉呈黃綠色調，從而可知北方於該

1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趙芝荃等），同註7，頁733圖二一之4。另外，同時發掘的西晉墓還出土了四繫釉陶罐，但墓號不明（參見：徐殿魁，＜偃師杏園村漢晉唐宋墓地＞，《中國考古學年鑑198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171）。
15. 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趙芝蓮），＜洛陽西郊晉的發掘＞，《考古》，1959年11期，頁610。
16. 王增新，＜遼陽三道壕發現的晉代墓葬＞，《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11期，頁42圖八、九。
17. 瀋陽市文物工作組(鄭明等)，＜瀋陽伯官屯漢魏墓葬＞，《考古》，1964年11期，圖版參之8。
18. 李宇峰，＜遼寧朝陽兩晉十六國時期墓葬清理簡報＞，《北方文物》，1986年3期，頁23圖一之10。
19. 臨沂地區文管會、蒼山縣文管會（宋彥泉等），＜山東蒼山縣晉墓＞，《考古》，1989年8期，頁716圖三之1、2。
20. 甘肅省文物隊等編，《嘉峪關壁畫墓葬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圖版六之3。
21. 甘肅省博物館（吳初驥），＜酒泉、嘉峪關晉墓的發掘＞，《文物》，1976年6期，頁6圖七，頁14圖二三。
2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二隊（蔣若是等），＜洛陽晉墓的發掘＞，《考古學報》，1957年1期，圖版肆之4及頁178的敘述。
23. 王武鈺，＜石景山老山西晉墓＞，《中國考古學年鑑198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73。
24. 甘肅省博物館（吳初驥），同註21，頁14，圖二三。
25.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等（李慶發），＜朝陽袁台子東晉壁畫墓＞，《文物》，1984年6期，頁29～45。

臺灣大學 期刊資料庫

一時期仍存在少數鉛釉作品。不過比起前述西晉墓的絳釉罐，器形明顯加大，釉色也有所不同。

㈡從南方晉墓出土的鉛釉小罐談起

自本世紀五十年代發掘江蘇宜興周墓墩西晉元康七年（297年）周處墓出土了一件絳釉小罐㉗（圖8），四十年來南方晉墓如獅子山1號西晉墓，㉘以及郭家山5號墓、㉙象山七號王廙墓㉚（圖9）、揚州邗江縣甘泉鄉109號墓㉛等東晉墓亦分別出土一件該類罐。就墓葬的時代而言，北方地區除了報告書所推測或屬魏晉時期的嘉峪關觀浦大隊9號墓、瀋陽伯官屯5號墓等二墓，另被籠統地定爲西晉十六國時期的朝陽十二台鄉3號墓等之外，其餘出土該類罐的墓葬均屬西晉時期。因此，南方墓葬所出絳釉罐的相對年代多要稍晚於北方，然而南方晉墓所出作品之造型、釉色，乃至於器肩三處細小支釘痕等特徵又與北方出土作品一致。其中，宜興西晉元康七年（297年）周處墓和南京象山王廙墓的絳釉無繫罐造型，與嘉峪關觀浦大隊11號墓或遼陽三道壕8號墓頗爲類似，說明它們有可能來自同一產區。相對於北方出土絳釉帶繫罐多安置橫繫，南京獅子山1號墓或邗江縣109號墓等兩座東晉墓作品則呈縱繫。肩置縱繫的絳釉罐於遼陽十二台鄉磚廠採集推測屬西晉十六國時期作品中亦可見到。

值得留意的是，比起北方以洛陽地區爲主的西晉墓經常出土該類小罐，儘管已發掘報導的南方六朝墓數量極爲龐大，然而除了上述幾座晉墓之外，其餘均未出土，出土絳釉罐的墓葬均集中於江蘇省，墓主的身份等級亦頗高。如周墓墩1號墓墓主周處爲南方土著豪強周氏家族成員，贈平西將軍；象山7號墓墓主王廙官至荊州刺史武陵侯，爲琅琊王氏家族成員；南京北郊郭家山5號墓墓主可能亦屬東晉王氏家族某支系成員之一；揚州邗江縣甘泉鄉墓主等級，據報告書推測應是秩位在千石上下的官僚。至於南京獅子山1號墓雖缺乏可判別墓主等級的直接證據，墓葬規模屬中型，不過出土青瓷達二十餘件，是迄今西晉中型墓中出土青瓷最爲豐富的墓葬，說明墓主應屬相對富裕的階層。㉜結合北方地區若干出土絳釉罐且可大致推測墓主身份的墓葬資料，則除了洛陽地區出土

26. 黎瑤渤，＜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1973年3期，頁20圖二二。
27. 羅宗真，＜江蘇宜興晉墓發掘報告——兼論出土的青瓷器＞，《考古學報》，1957年4期，圖版柒之2。
28. 南京市博物館（周裕興），＜南京獅子山、江寧索墅西晉墓＞，《考古》，1987年7期，頁616圖八之16。
29. 南京市博物館（周裕興等），＜江蘇南京北郊郭家山五號墓清理簡報＞，《考古》，1989年7期，頁606圖六之14。
30. 南京市博物館（袁俊卿），＜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11期，頁40圖三三。王廙東晉永昌元年（323年）歿。
31. 揚州博物館（李則斌等），同註12，頁25圖三之5。
32. 拙稿，＜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組合特徵及其有關問題＞，《故宮學術季刊》，8卷1期（1990），頁125。

數量較多，墓主包括若干中下級官僚或一般庶民之外，嘉峪關觀浦大隊9號墓伴隨出土有「武鄉亭侯」銎金印章，墓主或爲五品侯；同嘉峪關6號壁畫墓墓主被推測或係秩位在二千石至一千石的官吏。出土絳釉罐墓主身份的確認，以及晉墓出土鉛陶釉的種類，使我們有理由相信，主要做爲陪葬明器流行於東漢的鉛釉陶，至西晉時已經產生重大的變化，東漢墓常見的耳杯、盤、爐、罐、壺或井、倉、灶、屋以及各式各樣的人俑、動物俑等施罩鉛釉的作品，於西晉時除了北京地區等少數墓葬之外，已基本消失，西晉墓最常見的鉛釉陶作品卻是一墓多只出土一件，製作精巧的所謂絳釉小罐。而出土該類罐墓葬墓主當中，又包括不少貴族或官僚階級。特別是中原地區以外墓葬，不僅出土量稀少，且多出土於等級較高的墓葬。這不僅暗示了絳釉罐的產地及主要的消費市場，亦表明了其於當時若非是具有某種葬儀上的特殊用途，就是一種象徵財富或身份地位的珍貴器物，它們顯然與一般的青瓷器或素陶器的性質有別，而這在南方地區墓葬反映得尤爲突出。南方地區墓主當中不僅有南渡北人，亦包括義興周氏等吳會土著豪強一事，則格外引人注目。鉛釉陶的性質至十六國時期似仍未有太大的改變，經確認的十六國時期墓葬只有前述北燕馮素弗墓出土有黃綠釉壺（圖10），出土時與一件灰陶罐上置牛腿骨和肋骨陳設於墓室西壁龕台之中。該墓雖屬潛埋虛葬，㉝但出土文物極爲豐富，墓主馮素弗又是北燕天王馮跋之弟，爲北燕第二號統治者，不難想像鉛釉陶於當時仍然頗爲貴重。㉞雖則四世紀末至五世紀初高句麗勢力已向西發展至遼河流域，並燒製不少黃綠或黃褐色鉛陶釉，㉟故不能排除馮素弗墓的黃綠釉罐可能與高句麗釉陶有關。

綜觀晉墓所出絳釉或醬釉小罐，多數作品於造型、胎釉甚至燒造工藝等方面均大同小異，有較大可能來自同一區域或鄰近地區相關窯場所生產，然而目前還缺乏直接的資料來證實其具體的燒造地點和確實的用途。過去夏鼐氏曾經推測周墓墩1號周處墓出土的絳釉小罐，有可能是內盛貴重液體如香料之類賜葬時由洛陽送來的。㊱就個別墓葬出土情形而言，瀋陽伯官屯5號墓的雙繫絳釉罐係與漆盒、銅鏡共置於漆奩之內，㊲結合絳釉罐的尺寸或造型特徵，雖可提供我們若干揣測的空間並令人聯想到西方的玻璃器，不過其具體用途至今依然不明。另一方面，考慮到漢代鉛釉陶的出土分布及可能的燒造地區，㊳或南北燒製陶瓷的傳統，以及絳釉罐於各地區的出土頻率和隨著區域的不同所呈現出的墓主等級差異，筆者同意該類小罐應是北方地區窯場所生產。特別是絳釉罐的

33. 曹永年，＜說“潛埋虛葬”＞，《文史》31期（1988），頁79～86。
34. 不過，水野清一氏認爲，魏晉時期鉛釉陶的減少並非意味鉛釉陶特別珍貴，而應歸因於喪葬風俗的變化。（水野，＜綠釉陶について＞，《世界陶磁全集》卷8（東京：河出書房，1955），頁246）。
35. 魏存武，＜高句麗四耳展沿壺的演變及有關的幾個問題＞，《文物》，1985年5期，頁84。
36. 夏鼐，＜跋江蘇宜興晉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7年4期，頁106。
37. 瀋陽市文物工作組（鄭明等），同註17，頁554。
38. 漢代鉛釉陶的窯址至今未能發現，不過明顯流行於黃河流域和北方地區，以至於有學者將之稱爲「北方釉陶」。Wang Zhoug Shu, *Han Civiliz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44.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造型與南方晉墓出土陶瓷有別，但與北方這一時期無釉陶器傳統造型基本一致。如洛陽起重機廠西晉墓（M88）、㊴偃師杏園村西晉墓（M34）、㊵洛陽晉墓、㊶山西長治故縣村西晉墓、㊷西安西晉墓（M17）㊸等均出土了與所謂綠釉罐造型類似的陶罐，後者無疑是當地所產。其次，前述遼寧北燕馮素弗墓的黃綠釉細頸圓腹罐和伴出的陶罐，也與同省朝陽市北廟村北燕墓，㊹或朝陽縣後燕建興十年（395年）崔遹墓㊺所出陶罐造型基本相近。這樣看來，地處青瓷窯業蓬勃發展的江南地區晉墓出土北方綠釉罐一事，既再度透露該類小罐可能具有的特殊性質，也可糾正過去絕大多數研究者認爲南方晉墓陶瓷一律來自南方鄰近地區窯場的片面看法。

魏晉十六國墓出土的鉛釉陶器種類單調，數量有限，於已正式報導的該一時期墓葬數所佔比例亦偏低，說明了曹魏至北朝之間鉛釉的生產無疑是處於極度低迷的狀態，㊻然而出土資料卻也反駁了過去部份研究者所主張鉛釉陶於魏晉時已經絕跡的說法。㊼陝西華陰縣一號墓年代的確認，不僅表明曹魏時鉛釉陶的燒製傳統仍未完全斷絕，其出土作品種類及造型特徵與東漢時期同類作品大致雷同一事更是發人省思。換言之，華陰縣三國墓出土的鉛釉明器模型，提供了今後檢驗流傳於世的大量所謂漢代鉛釉陶確切年代的重要線索，值得重視。

㈢北朝鉛陶釉的動向

就目前的考古發掘資料看來，魏晉十六國鉛釉陶歷經了幾次大的轉折。即曹魏墓所出鉛釉作品基本上仍沿續漢代傳統，至西晉時絕大多數墓葬鉛釉陶一般僅見所謂的綠釉小罐，後者性質既與漢代鉛釉明器有別，亦不見流行於漢代的鉛綠釉。遼寧北燕太平七年（415年）馮素弗墓雖出土了與綠釉色系有別的黃綠釉作品，然而其似與承襲漢代鉛

3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唐城隊（楊煥新），＜1984至1986年洛陽市區漢晉墓葬發掘簡報＞，《考古學集刊》7期（1991），頁74圖一六之1、3。
4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趙芝荃等），同註7，頁728圖十一之1、3。
4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二隊（蔣若是等），同註22，圖版貳等。
42. 朱曉芳等，＜山西長治市故縣村出土一批西晉器物＞，《考古》，1988年2期，頁185圖三之4。
43.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考古隊（劉采運），＜陝西長安縣206基建工地漢、晉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9年5期，頁43圖5之12。
44. 朝陽地區博物館等（徐基等），＜遼寧朝陽發現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10期，頁918圖六之3，頁921圖10之6。
45. 陳大爲等，＜遼寧朝陽後燕崔遹墓的發現＞，《考古》，1982年3期，頁272圖五之1、3。
46. 矢部良明氏亦曾指出，西晉至十六國時期華北至東北一帶可能仍存在燒造鉛釉陶的傳統，同註1，頁43～51。
47. 如三上次男，《陶器講座》卷5，中國Ⅰ（東京：雄山閣，1982），頁275。李知宴氏也主張北方魏、西晉墓中沒有發現釉陶（李，《中國釉陶藝術》（香港：輕工業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89），頁100），並認爲北燕太平七年（415年）馮素弗墓的釉陶罐是三國以後北方發現最早的釉陶器（頁101）。此外，巽善信氏則認爲北魏司馬金龍墓的作品是漢代以來再度出現的時代最早之鉛釉陶。（參見：巽，＜三彩に關する一考察＞，《天理參考館報》6期（1992），頁86）。

釉的高句麗釉陶有關。出土高句麗釉陶的墓葬中，封土石室壁畫墓屬王室貴族墓，石室規模亦較大，㊽表明高句麗釉陶於當時亦屬高檔的工藝品。鉛釉陶的燒造要到北魏中期後段才再度出現復甦的景象，在此之前至十六國間中原地區鉛釉陶的音訊杳然，至今未見任何可靠的實物。

北魏中期偏後的鉛釉陶，以著名的山西大同太和八年（484年）司馬金龍墓所出作品最具代表性。該墓出土的鉛釉陶包括一件器蓋和座，以及數量高達三百八十五件的俑類。㊾鉛釉色調計有紅褐、黑褐、黃褐和綠釉，釉色頗不安定，㊿但施釉陶俑中有不少還於釉上施加白、黑、紅等彩飾，並有以白色塗料於俑身繪出條狀斑紋的作品（圖11）。五世紀北魏建都平城期間墓葬出土有鉛釉陶的，還可見於大同市城南的俗稱「張女墳」墓群，實際發掘墓葬數爲167座。釉色種類包括醬、綠、黑、黃等，一般呈帶紅色胎，器形主要爲壺和罐。據報告書所言，除少數實用器外，其餘均爲高僅5～6公分的隨葬明器小罐。(51)其中，110號墓的小黃褐釉罐罐底露胎（圖12），114號墓的醬釉長頸瓶則施滿釉，底面殘存支釘痕（圖13），推測應是以正燒技法燒成，其與晉墓綠釉罐多以覆燒施滿釉的燒造技術有別。從長頸瓶造型與內蒙包頭市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姚齊妃墓，(52)或河南杏園村北魏正始五年（508年）墓所出灰陶作品大體一致，(53)筆者推測其相對年代可能在五世紀後期至六世紀初。而與司馬金龍墓所在位置相隔不遠的五世紀後半北魏墓中，亦曾出土通高在10～13公分的醬釉、褐釉或紅褐釉等釉陶器。(54)後者出土的盤口罐造型與前述張女墳第191號墓陶罐造型一致，(55)時代也應相當。出土資料表明，一度中斷的鉛釉陶於五世紀後半再度復甦，並且有所發展，大同雲岡石窟台上寺院址甚至曾發現推測屬五世紀後半期的綠褐釉平瓦。(56)不過，除了累世倍受寵信的大將軍司馬金龍墓之外，一般不見施釉俑類，釉陶壺罐則以器形偏小的盤口或侈口帶頸弧肩鼓腹罐較爲常見。鉛釉陶俑或明器模型於稍晚的陝西長安縣第1、2號北朝墓亦可

48. 魏存武，同註35，頁84。另耿鐵華等，＜集安高句麗陶器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1期，頁55～63參照。
49.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等，＜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1972年3期，頁20～33轉64。另參見五味充子，＜司馬金龍墓＞，《新發掘報告、中國の美術と考古》（東京：六興出版，1977），頁208～9。
50. 由於司馬金龍墓發掘報告所載圖版極不清晰，因此矢部良明氏曾將出土的釉陶俑誤認爲三彩（同註1，頁54）。從稍後出版的彩色圖版看來，出土的釉陶俑均爲單色釉，但施釉不勻，燒製不夠穩定以至於呈現出淺深不同的色調（參見：《山西陶磁》中國陶瓷全集第28冊，（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十美乃美，1984），圖4～19）。不過，李知宴氏則有不同的評價，認爲厚薄不勻的釉面，是工匠們有意追求釉面彩色效果的措施（李，同註47），頁102。
5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92年8期，頁9。
52. 鄭隆，＜內蒙古包頭市北魏姚齊妃墓＞《考古》，1988年9期，頁857圖二。
5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徐殿魁），＜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9期，頁825圖九之2。
54. 胡平，＜大同發掘十座北魏墓＞，《中國文物報》，1990年8月30日；＜大同市北魏墓葬＞，《中國考古學年鑑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頁144。
5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同註51，頁7圖十五。
56. 水野清一，＜隋唐陶磁のながれ＞，《世界陶磁全集》卷9（東京：河出書房，1956），頁164。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見到，㊼造型、種類均與東魏、北齊陶俑一脈相承，應可視爲是隋唐時期大量出現的釉陶俑之前身。

北朝的鉛釉至東魏，特別是北齊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奠立了往後鉛釉陶在中國陶瓷史上屹立不搖的地位，與高溫釉分庭抗禮。其集中表現在鉛釉陶的漸趨普及和胎釉的精煉等方面，並逐漸成爲當時人們新興的審美對象。截至目前，河北天平四年（537年）高雅夫婦墓㊽（圖14～16）和山東興和三年（542年）房悅墓等兩座東魏墓㊾（圖17～18），以及河南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㊿武平七年（576年）李雲墓、(61)山東淄川北齊墓、(62)河北河清四年（565年）封子繪墓、(63)武平七年（576年）高潤墓、(64)山西河清元年（562年）庫狄洛墓(65)（圖19～20）、武平元年（570年）婁叡墓(66)等北齊墓都出土了鉛釉陶。分布於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等各省分，西魏和北周墓至今未見出土。器形主要包括各式壺、罐、瓶、盒、碗、燈、盂和蓮花尊等，但無鉛釉俑類是值得留意的現象。其中，李雲墓出土兩件於米黃透明釉上飾綠彩的四繫罐；范粹墓出土兩件白釉綠彩三繫罐另一件白釉綠彩細頸瓶（圖21～22），婁叡墓亦見一件黃綠釉彩小盂（圖23）。它們被做爲著名的唐三彩的前身而爲學界所重視，筆者亦曾考察上述作品的器形、裝飾、及其存在時代，並經由與南方青瓷的比較，認爲其釉彩裝飾的契機應是受到南方六朝青瓷褐斑加飾的啟示。(67)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以來發掘洛陽北魏大市遺址，(68)經復原計出土有碗、杯、盂、罐等二十餘件釉陶器,胎質較粗含細小砂粒,呈土紅或黑灰色調。釉色種類除了單色醬釉、青綠釉、青黃釉之外，還有在黃色底釉上施草綠的二彩釉陶器，上述資料雖透露了北齊二彩器的可能淵源，可惜報告書未刊載圖版，詳情不得而知。其次，引人側目的是同遺址還出土了釉下彩陶碗（圖24）。依據報書的描述，則係白粉塗料繪成帶狀聯珠紋，聯珠紋間飾做自西方玻璃器的凸起乳釘，而後施單

57.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王育龍等），＜長安縣北朝墓葬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90年5期，頁57～62。
58. 河北省文管處(何直剛)，＜河北景縣北魏高氏墓發掘報告＞，《文物》,1979年3期,頁17～31。
59. 山東省博物館文物組（夏名采），＜山東高唐東魏房悅墓清理紀要＞，《文物資料叢刊》2期（1978），頁105～9。
60. 河南省博物館，＜河南安陽北齊范粹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1期，頁47～51轉86；安陽縣文教衛生管理站，＜河南安陽縣發現一座北齊墓＞，《考古》，1972年1期，頁45～47。
61. 周到，＜河南濮陽北齊李雲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年9期，頁482～84。
62. 淄博市博物館等（張光明），＜淄博和莊北朝墓葬出土青釉釉蓮花尊＞，《文物》，1984年12期，頁64～67。
63. 張季，＜河北景縣封氏墓群調查記＞，《考古通訊》，1957年3期，頁28～37。
64.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考古》，1979年3期，頁235～43轉234。
65. 王克林，＜北齊庫狄迴洛墓＞，《考古學報》，1979年3期，頁377～401。
6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市北齊婁叡墓發掘簡報＞，《文物》，1983年10期，頁1～23。
67. 拙稿，＜綜述六朝青瓷褐斑裝飾－－兼談唐代長沙窯及北齊鉛釉二彩器彩飾來源問題＞，《藝術學》4期（1990），頁107～63。
68. 鐵國祥，＜洛陽漢魏故城＞，《中國考古學年鑑199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25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杜玉生），＜北魏洛陽城內出土的瓷器與釉陶器＞，《考古》，1991年12期，頁1091～95。

醬釉，或青綠和青黃相間的色釉。類似的作品於香港私人收藏品中亦可見到，(69)其於釉下飾白泥紋飾的技法特殊，非典型的釉下彩。而以白色塗料施於鉛釉陶上的例子，則見於前述司馬金龍墓出土的陶俑。無論如何，北魏大市遺址出土的釉陶器既表明了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仍持續生產並曾一度模倣西方工藝品，更重要的是做爲北魏最繁華的商業市場大市城廓內出土釉陶器一事，明示了北魏鉛釉陶器皿類並非只用來殉葬，而有較大可能屬廣義的日常生活器皿。這從伴隨出土的陶瓷當中未能見到可確認屬明器的俑類或模型類亦可間接窺測得知。

雖然可能帶有若干考古發掘的偶然因素，出土鉛釉陶的北朝墓葬墓主亦多屬貴族官僚階級。東魏、北齊墓目前不見釉陶俑類，但若就器皿類而言，則要比北魏作品豐富，並出現了如山東淄博和莊北齊墓出土的高達59公分的黃褐釉貼花蓮花尊(70)（圖25）。與後者作風類似的貼花飾壺於山東淄博寨里北齊窯址亦曾出土。寨里窯既燒青瓷、黑褐釉又兼燒鉛釉陶，並發現推測可能是鉛釉陶的素燒坯。(71)從而得知，已確認的燒造三彩鉛釉的唐代窯址，如河南鞏縣窯、河北邢窯和陝西省耀州窯等(72)附屬於高溫色釉窯場的窯業制度，至遲於北齊時已經形成。依據報告書刊載的東魏、北齊鉛釉作品圖版及其對於胎釉的描述，不難發現其釉色已趨淡，胎色亦趨潔白，特別是北齊時出現了不少於細白近高嶺土胎上施罩薄釉的作品，並漸成爲一種時尚。出土資料可證實數十年前水野清一所指出，中國低溫釉陶隨著時代的推移，胎、釉的精煉而漸邁入於白胎上施罩無色透明釉的精闢史觀，(73)亦提供理解北方白瓷出現軌跡的重要線索。矢部良明氏曾經提到，做爲白瓷出現要件的精選純淨白胎，施罩透明釉的工藝最早見於鉛釉陶；(74)長谷部樂爾氏進一步指明，安陽北齊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出土的於白胎上施罩無色透明釉的白鉛釉陶或可視爲意圖燒製白瓷的反映，而該墓且伴隨出土了中國最早的白瓷，白瓷與鉛白釉陶於北方同時出現一事是值得留意的現象。(75)就出土資料而言，前述北魏洛陽大市

69. 參見《徐氏藝術館・陶瓷Ⅰ，新石器時代至途代》（香港:徐氏藝術館，1993），圖64。另外，大市遺址出土的乳釘紋釉陶小碗彩圖可參見：考古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重要考古收藏》（北京：科學出版社），此爲收藏簡介。
70. 淄博市博物館等，同註62，頁65圖三。另《山東省文物展》（東京：西武美術館：朝日新聞社，1986），頁152圖88。不過上述發掘報告或展品解說均認爲蓮花尊屬青瓷。筆者依據所揭示的彩圖判斷有較大可能屬鉛釉陶。
71. 山東淄博陶磁史編寫組等（王恩田），＜山東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窯址調查紀要＞，《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社，1984），頁352～59。另外同報告書還提到淄博辛店北朝崔氏墓群出土的一件黃釉高足盤，屬寨里窯鉛釉產品（頁358）。
72. 劉建洲，＜鞏縣唐三彩窯址調查＞，《中原文物》，1981年3期，頁16～22；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銅川工作站（禚振西等），＜銅川黃堡發現唐三彩作坊和窯爐＞，《文物》，1987年3期，頁23～31轉37；內丘縣文物保管所（賈忠敏等），＜河北省內丘縣邢窯調查簡報＞，《文物》，1987年9期，頁1～10等參照。
73. 水野清一，同註56，頁165。
74. 矢部良明，同註1，頁95。另同氏《中國陶磁の八千年》(東京：平凡社，1992），頁106。
75. 長谷部樂爾，＜中國陶磁史短見－－シカゴ美術展によせて＞，《シカゴ美術館・中國美術名品展》（大阪：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等，1989），頁126。

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

遺址曾出土疑似白瓷的作品；⑯山西大同北魏文明皇后永固陵出土的白釉爐被認爲是北方早期鉛釉作品。⑰可惜前者未經正式報導，後者從原發掘報告得知曾遭多次盜掘並混入若干後世白瓷殘片，⑱且均未公布圖版，詳情不得而知。不過觀察已知的北朝鉛釉陶的胎釉變遷，五世紀末永固陵時期鉛釉陶不太可能已經達成胎釉精純的水準。鉛釉陶要至東魏、北齊時才逐步加深意識到胎釉的選煉，自北魏中後期再度出現的鉛釉陶於北齊時有了較大的發展，後者可說是隋唐鉛釉陶的一個重要醞釀階段。東魏北齊墓出土的鉛釉陶器形既與同一時期青瓷有共通之處，又基本不見施罩鉛釉的明器俑類和模型，暗示了當時鉛釉陶的生產主要並非供應墓葬明器之需。

三、墓葬出土青瓷概況和北方青瓷的發展

(一)、北方出土晉代青瓷諸問題

近年來的考古發掘表明，河南永城縣、⑲洛陽燒溝、⑳中州路㉑唐寺門㉒河北安平㉓或山東諸城㉔等北方漢墓都出土有青瓷器。但做爲北方漢墓出土青瓷的最早實例，則是1924年北京歷史博物館所發掘著名的河南信陽游河鎮擂鼓台漢墓出土的洗、碗等作品。㉕然而若檢視擂鼓台漢墓報告書所載青瓷，敞沿洗口沿下方押印網紋帶，整體造型特徵與江蘇張家山西晉元康七年（297年）墓㉖或南京西崗等西晉墓同類作品大體相近㉗（圖26）；類似的青瓷碗亦見於南京甘家巷吳建衡二年（270年）墓（M29）、㉘南京板橋鎮石閘湖西晉永寧二年（302年）墓。㉙其次，擂鼓台墓出土的青瓷盤口四繫罐

76. 李輝柄，＜成果展覽中的瓷器＞，收入＜考古研究所四十年成果展覽筆談＞，《考古》，1991年1期，頁73。
77. 矢部良明，同註1，頁93；李知宴，同註47，頁102。
78. 大同市博物館等（解廷琦），＜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7期，頁29～35。
79. 李俊山，＜永城太丘一號漢畫像石墓＞，《中原文物》，1990年1期，頁17圖十～十二。
80.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洛陽燒溝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圖版拾捌之3（M147）、圖版貳壹之1（M175）及頁107（M1034）等。
8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中州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圖版捌伍。
82.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張劍等），＜洛陽唐寺門兩座漢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984年3期，圖版貳之3。
83. ＜安平彩色壁畫漢墓＞，《光明日報》，1972年6月22日，正式報告參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安平東漢壁畫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圖89。
84. 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山東文物選集》（普查部分）（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頁111圖214。
85. ＜信陽漢冢發掘記＞，《國立歷史博物館叢刊》一年2册(1926)，頁1～2另圖下。
86. 南京博物院（張敏），＜江蘇江寧縣張家山西晉墓＞，《考古》，1985年10期，頁910圖三之3。
87. 南波，＜南京西崗西晉墓＞，《文物》，1976年3期，頁60圖一六之1。
88. 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棲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年5期，頁319圖七之2。
89.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板橋鎮石閘湖晉墓清理簡報＞，《文物》，1965年6期，頁42圖十一之7。

㉚（圖27）更與南京趙士岡吳鳳皇二年（273年）墓、㉛南京郎家山西晉元康三年（293年）墓㉜所出作品一致。結合青瓷洗所飾印花網紋帶是吳至西晉時期南方青瓷流行的裝飾題材，㉝可以肯定擂鼓台所謂漢墓出土青瓷的相對年代應在三國吳末至西晉時期。因此，這座被視爲中國首次經正式考古發掘之漢墓出土青瓷，並爲歷來的研究者如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陳萬里、馮先銘等一再徵引的擂鼓台墓出土青瓷的年代應予修正。㉞擂鼓台墓出土的作品正是北方出土南方六朝青瓷的濫觴。

就目前的出土資料而言，北方漢墓出土青瓷似以河南地區較爲集中，㉟其既與前述西晉鉛釉小罐多出土於洛陽地區，也與北方晉代青瓷的主要分布地點有重疊之處，間接地反映了河南特別是洛陽地區是施釉陶的主要消費市場。就筆者所能掌握的資料，北方出土晉代青瓷計有下列諸例。即河南宜陽柳泉（遺址性質不明）、㊱南陽東關墓、㊲偃師城關鎮墓、㊳安陽孝民屯墓（M154）、㊴洛陽澗西墓、㊵洛陽3號墓、26號墓、西晉太康八年（287年）墓（M1）、㊶西晉永寧二年（302年）晉士孫松之女墓（M22）、

90. 原報告未載該件作品圖版，本文是依據《世界美術全集》卷14（東京：角川書店，1963），頁160圖32下得以確認。
91. 王志敏，＜從七個紀年墓葬漫談1955年南京附近出土的孫吳兩晉青瓷器＞，《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11期，頁11圖三。
92. 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朱江等），《南京出土六朝青瓷》（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頁33圖22。
93. 有許多考古發掘資料可以證實此點。限於篇幅，本文無法一一列舉，但可參見馮先銘氏的簡要論述，（馮，＜略談魏晉至五代瓷器的裝飾特徵＞，《文物》，1959年6期，頁18～21）。
94. 歷來均將擂鼓台墓出土青瓷的年代定爲漢代，並曾經一度被當作漢代已生產瓷器或咖接六朝瓷器的例證。涉及的論文甚多，本文依論文發表年順摘要列舉如下：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磁史稿》（東京：文中堂，1943）後收入同氏著作集（東京：朝日新聞社，1977）頁18；水野清一，＜灰釉陶について＞《世界陶磁全集》卷8（東京：河出書房，1955），頁220；陳萬里，《中國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頁3；馮先銘，＜略談北方青瓷＞，《故宮博物院院刊》，1958年1期，頁56；G. St.G.M. Gompertz, *Chinese Celadon Wares* (Faberand Faber Limited, 1958), p. 38；三上次男，《陶器講座》卷5，中國Ⅰ。古代（東京：雄山閣，1982），頁252。此外，據云擂鼓台墓還出土了東漢永元十一年（99年）銘文磚，不過據小山富士夫氏引梅原末治所言，該紀年磚係出土於鄰近墓葬，與出土青瓷的墓葬（編號甲墓）無涉。（小山，同前文，頁18）。
95. 此外，據佐藤雅彥氏文，則陝西咸陽、河北懷安（萬安北沙城）、山東臨沂等地亦曾出土，（佐藤，＜漢代の陶磁＞，《世界陶磁全集》卷10（東京：小學館，1982），頁217）；筆者亦曾於陝西歷史博物館陳列室實見若干同省出土的漢代青瓷。
96.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近年來搜集的珍貴歷史文物＞，《中原文物》，1984年3期，圖版拾壹之4。
97.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等（王袞祥等），＜河南南陽東關晉墓＞，《考古》，1963年1期，頁27圖四之1～3。
98. 林樸等，＜晉代青瓷歌＞，《史學月刊》，1985年2期，頁118封底圖。
9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孫秉根)，＜安陽孝民屯晉墓發掘報告＞，《考古》，1983年6期，頁507圖八之1。但報告書稱該墓出土的四繫罐呈褐色，本文據圖版推測應係青瓷。
100. 侯鴻鈞，＜洛陽出土西晉鶴頭壺＞，《中原文物》，1983年3期，頁118。
10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二隊（蔣若是等），同註22，頁178～80，另圖版肆之3、6。

臺灣大學 期刊資料庫

㉒山東諸城墓（M1）、㉓蒼山縣卞莊墓、㉔蒼山縣塢莊鄉墓、㉕淄博崔府君墓、㉖遼寧上王家村壁畫墓、㉗河北邢台墓、㉘井陘礦區墓、㉙滿城縣南閻童（遺址性質不明）㉚石家莊市（遺址性質不明）、㉛天津東郊務本古城址、㉜吉林集安禹山高句麗墓（M3319），㉝以及前述信陽擂鼓台墓等。此外，舊旅順博物館藏的一件鷄頭壺傳爲滿州出土；㉞陝西省歷史博物館亦陳列少量同省寶鷄等地出土的吳晉青瓷，然出土詳情不明。出土頻率以河南省居高，河北、山東次之。從作品本身的造型、胎釉、裝飾等特徵，並考量北方的燒瓷傳統，上述北方出土漢晉青瓷無疑是來自南方以浙江青瓷窯系爲主的窯廠所生產，本文不再贅述。㉟以下擬先從北方個別青瓷器類的出土情況結合南方同類作品的存在狀況進行考察。

雖然北方出土晉代青瓷數量有限，但個別器類於墓葬或遺址的出土頻率卻頗引人注目，即以所謂的獅形器出土頻率最高（圖28），分別出土於三座墓葬另二處性質不明的遺址。就其細部造型特徵而言，可區分爲二式，其中一式略顯豐肥的作品目前只見於洛陽宜陽柳泉出土品，不過類似的作品於南方江西南昌京家山西晉墓中亦可見到。㊱北方出土的其餘四件獅形器造型作風大體一致，時代也應相近。從南方同式青瓷獅形器絕大多數均出於西晉墓，東晉以後業已消失等情形看來，無疑是西晉時期流行的器類之一。㊲因此，偃師城關鎮晉墓、邢台西晉墓青瓷獅形器的相對年代與墓葬時代基本一致，不過河北滿城縣南閻童出土的被定爲北齊時期同式作品之年代，則應予修正。值得留意的

10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蔣若是等），同註22，圖版肆之5。但包括報告書在內的一部分論文，均將該墓墓主誤讀爲「孫世蘭女」，本文據陳直，＜對“洛陽晉墓的發掘”與“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兩文的意見＞，《考古通訊》，1958年2期，頁59～61一文訂正。
103. 諸城縣博物館(韓崗)，＜山東省諸城縣西晉墓清理簡報＞，《考古》，1985年12期，頁1117。
104. 山東省博物館等（張其海），＜山東蒼山元嘉元年畫像石墓＞，《考古》，1975年2期，頁125圖二之3、4。
105. 臨沂地區文管會等（宋彥泉等），同註19，頁717圖四，圖版肆之1、4、6。
106. 淄博市博物館等（張光明等），＜臨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簡報＞《考古》，1985年3期，圖版肆之2。
107. 李慶發，＜遼陽上王家村晉代壁畫墓清理簡報＞，《文物》，1959年7期，頁64圖4。
108. 李哲賓等，＜邢台清理一座西晉墓葬＞，《中國文物報》，1989年8月18日。
109. 程明達，＜河北井陘礦區清理一座古墓＞，《考古通訊》，1958年5期，頁35圖四。
110. 河北省博物館等，《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175圖304。
111. 河北省博物館等，同註110，圖310。
112. 韓嘉谷，＜東郊區務本古城＞，《中國考古學年鑑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113。
113. 耿鐵華等，同註48，頁58圖二之4。另外，同禹山墓區第2208號墓還出土了報告人所謂的「乳白瓷壺」(頁56圖一之21)。作品已殘，從實測圖推測器形頗似3319號墓出土的青瓷盤口雙繫罐。
114. 杉村勇造等編，《旅順博物館圖錄》（東京：座右寶刊行會，1953），圖版41～42。
115. 雖然也有少數研究者主張北方出土漢、晉青瓷形制與南方青瓷不同，應是北方生產的青釉器（輕工業部陶瓷工業科學研究所編著，《中國的瓷器》修訂版，北京：輕工業出版社，1983，頁117），但未出示任何依據。此外，趙青雲氏亦承襲了這個錯誤看法，（趙，＜河南彩青瓷的起源與發展＞，《華夏考古》，1987年1期，頁220。
116. 江西省博物館(許智范)，＜江西南昌市郊的兩座晉墓＞，《考古》，1981年6期，圖版捌之2、3。
117. 拙稿，同註32，頁108。

是，山東淄博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崔猶墓（M15）也出土了青瓷獅形器，其造型作風既與前述滿城縣南閻童作品如出一轍，也與江蘇江寧縣張家山西晉元康七年（297年）墓出土者一致，㊳無疑亦屬西晉時期作品。然而崔猶墓的年代則與獅形器的存在時代相差近二百年，這是觀察北方出土晉代青瓷時，首先出現的令人疑惑不解之處。青瓷獅形器的命名和用途至今見解分歧，未有定論，儘管北方所出晉代青瓷數量有限，獅形器卻佔有突出的比例，並可能曾經傳世後再行入擴，是極爲特殊的現象。

獅形器之外，北方晉代青瓷的出土頻率依次爲四繫罐（5處）、盤口壺（4座）、碗盌類（4座）、鷄頭壺（3處），至於杯、勺、筒形罐、虎子等只見於個別墓葬。經由與南方衆多可判明相對時代墓葬所出同類作品的比較得知，上述北方出土各類青瓷作品的所屬時代，多數與報告書所推定的墓葬年代相當，但亦存在少數可再進一步檢討的墓葬。特別是山東蒼山縣卞莊報告書所謂的劉宋元嘉元年（424年）畫像石墓出土的青瓷碗和小盌。與該墓類似的碗既見於南京雨花台東晉墓，㊴其小盌亦與南京草廠門㊵或宜興周墓墩等㊶等西晉墓所出作品相近。此外，蒼山縣卞莊墓伴隨出土的長方陶槅也與洛陽晉墓（M27）、㊷河南孟津西晉墓（M20）、㊸山西運城十里鋪晉墓作品頗爲類似，㊹其陶盤形制更是與宜興西晉元康七年（297年）周處墓陶盤完全一致。㊺這不僅提示了北方出土陶器之中可能包含若干南方作品，亦說明了該墓青瓷入擴的時間應在西晉時期。過去方鵬鈞氏等曾考察蒼山縣卞莊墓畫像題句，認爲是魏晉人使用漢代畫像石墓，儘管方氏等人推測同墓伴出的陶瓷或爲東漢遺物一事與事實不符，然而其對於該墓葬的年代觀則與筆者經由出土青瓷的比較所得結論大體相近，㊻爲西晉人利用漢畫像石墓增添了一個實例。另一方面，做爲報告者判別墓葬年代重要物證之一的遼陽上王家村壁畫墓出土的青瓷虎子，雖有學者主張其年代要晚至四世紀二十年代，㊼然而從浙江嵊縣西晉元康八年（298年）墓曾出土類似作品看來㊽其相對年代應約在三世紀末期。至於河北石家莊市出土的報告書所謂北朝青瓷四繫罐造型亦不見於當時北方陶瓷（圖29），而與南京西晉永寧二年（302年）墓所出作品一致，㊾無疑是南方輸入的晉代青瓷。此

118. 南京博物院（張敏），同註86，圖版陸之1。
119. 岡田芳三郎等，＜南京中華門外雨花臺の六朝古墓＞，《史林》，26卷3期（1941），頁487圖四。
120. 賀雲翱，＜南京草廠門發現晉墓＞，《考古》，1987年4期，頁380圖二之3。
121. 羅宗真，同註27，頁97圖10之1、2。
12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二隊（蔣若是等），同註22，頁178圖九之6。
123.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趙春青），＜洛陽孟津晉墓、北魏墓發掘簡報＞，《文物》，1991年8期，頁51，圖五之10。
12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王志敏），＜山西運城十里鋪磚墓清理簡報＞，《考古》，1989年5期，頁441，圖四之18。
125. 羅宗真，同註27，圖版參之2。
126. 方鵬均等，＜山東蒼山元嘉元年畫像石題記的時代和有關問題的討論＞，《考古》，1980年3期，頁271～78。
127. 池田厚史，＜虎子雜考＞，《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20號（1984年度），頁198。
128. 嵊縣文物管理委員會（袁之橋），＜浙江嵊縣清理一座西晉殘墓＞，《文物》，1987年4期，頁50圖二。
129.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同註89，頁41圖九。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外，就如發掘報告書所言，洛陽澗西墓或山東蒼山縣莊塢鄉西晉墓出土青瓷鷄頭壺均屬西晉時期。該類作品於南方六朝墓中經常可見，並且隨著時代造型有所變化，故傳滿州出土的早年被定爲宋代或宋以前的鷄頭壺之年代亦應在西晉時期。

限於經正式報導出土有青瓷的北方晉墓數量有限，目前不易確認南方青瓷在北方地區的使用情況。就可確定墓葬規模的部分墓葬而言，除了山東蒼山縣卞莊墓、莊塢鄉墓、河南南陽東關墓等係利用漢畫像石墓改建而成；安陽孝民屯墓（M154）屬小型的豎穴土坑墓等之外，多數均屬中型以上規模墓葬。其中洛陽太康八年（287年）墓和晉尚書北地傅宣故命婦士孫松之女墓，更是屬墓道長達三十餘米的大型墓，後者兩座洛陽西晉紀年墓和前述山東蒼山縣莊塢鄉墓亦伴隨出土了鉛釉陶。[130]結合前述鉛釉陶的可能使用階層，似可推測由南方輸入的青瓷於北地的消費層級亦較高，雖則青瓷器於當時南方廣泛地出土於一般庶民墓葬。過去曾有學者依據遼東與南方東吳、西晉通過海路互有往來，進而推測遼陽壁畫墓出土的青瓷或是從海路運來的。[131]雖然朝鮮半島百濟領域也曾出土不少晉代青瓷，[132]似乎沒有理由排除東北地區出土的南方青瓷，有經由朝鮮半島輾轉傳入的可能性。不過前述吉林集安禹山高句麗中期墓出土的南方青瓷，則有更大可能是利用著名的高句麗南北道由遼陽或瀋陽帶來的。[133]

(二)北方青瓷起源諸說

可確認屬於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前出土有青瓷的北朝墓計二座，分別是著名的山西大同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司馬金龍夫婦墓和同年營建完工，埋葬歿於太和十四年（490年）文明皇后的永固陵。司馬墓出土一件青瓷唾壺，[134]從其造型與東晉、南朝作品的比較，應如今日研究者所一致認爲是來自南方地區窯廠。永固陵僅存推測或爲青瓷的殘片若干，[135]器形、胎釉未經報導，故筆者雖然可以理解矢部良明氏就常識性判斷其亦屬南方作品，[136]然而該墓曾遭多次盜擾，詳情不明。北魏墓出土青瓷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

130. 太康八年墓和士孫松女墓出土有鉛釉小罐一事，係由報告書的行文推測而知，參見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二隊（蔣若是等），同註22，頁178。
131. 張小舟，＜北方地區魏晉十六國墓葬的分區與分期＞，《考古學報》，1987年1期，頁41。
132. 關於朝鮮半島出土六朝青瓷的論述，參見三上次男，＜漢江地域發現の四世紀越州窯青磁と初期百濟文化＞，《朝鮮學報》81期（1976），頁357～80。此外，小田富士雄氏則訂正了三上氏論文中若干遺址名稱與出土作品不符的疏失，（參見小田，＜南朝塼墓よりみた百濟、新羅文物の源流＞，《九州文化史研究所紀要》26期（1981），頁72。最近的綜合性討論及研究回顧，可參見門田誠一，＜百濟の地方支配と中國陶磁－－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冊封、除爵と領域支配の考古學的檢討のために＞，《貿易陶磁研究》13期（1993），頁50～64。
133. 不過，報告者耿鐵華氏等（同註48，頁60）將禹山3319號墓出土的南方青瓷盤口壺誤認爲是中原的產品，應予訂正。另外，高句麗南北道問題參見：李健才，＜關於高句麗南北道的探討＞，《歷史地理》8期（1990），頁142～49。
134.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等，同註49，頁33圖21。
135. 大同市博物館等（解廷琦），同註78，頁32。
136. 矢部良明，同註1，頁53。

（494年）遷都洛陽不久的六世紀初期，情況已有所改變，不僅出土分布擴大，個別墓葬青瓷數量和種類也明顯增多。伴隨出土青瓷的六世紀北魏晚期墓計有：河南孟縣永平四年（511年）司馬悅墓（唾壺、碗）、[137]偃師熙平元年（516年）元睿墓（碗）、[138]洛陽孝昌二年（526年）元義墓（殘片）、[139]偃師孝昌二年（526年）華染墓（碗、燭台）[140]（圖30）、偃師聯體磚廠2號墓（鷄頭壺、碗、盤）[141]（圖31～32）、洛陽武泰元年（528年）元邵墓（鷄頭壺、罐）[142]孟津太昌元年（532年）王溫墓（不明）、[143]河北河間延昌四年（515年）邢偉墓（唾壺、碗）、[144]景縣正光二年（521年）封魔奴墓（碗）、[145]吳橋1號墓；[146]山西大同正始二年（504年）封和突墓（殘片）；[147]太原神龜三年（520年）辛祥墓（鷄頭壺、碗、托）[148]（圖33）山東淄博延昌元年（521年）崔猶墓（獅形器、杯）[149]和陝西華陰熙平二年（517年）楊舒墓（唾壺）等[150]（圖34）。其中崔猶墓的獅形器（同圖28）已如前所述屬西晉時期作品，其餘青瓷種類均不出南方青瓷範圍，目前不見可確認具北方特有器形的青瓷作品。所謂北方青瓷起源問題，見解分歧，而這似乎又與研究者個人所掌握的訊息以及對於北方窯業發展水平的主觀評價有關。如過去長谷部樂爾氏在涉及上述墓葬出土之部分青瓷產地時認爲，司馬悅、元邵、封魔奴、邢偉等墓出土作品均屬南方青瓷，[151]然而上述四墓當中除了司馬悅青瓷於發掘報告書刊載有不甚清晰的圖片之外，其餘三墓青瓷圖版並未正式公布，推測若非是其本人的親自見聞即應是同氏主觀的常識性判斷。事實上，造成對於北方青瓷起源時代見解不一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在於北方六世紀前期墓出土的青瓷與南方作品有許多類似之處，特別是不易與湖南、江西或湖北等省南朝墓出土作品具體區別一事密切相關。因

137. 孟縣文化館尚振明，＜孟縣出土北魏司馬悅墓志＞，《河南文博通訊》，1980年3期，頁40～41；孟縣人民文化館（尚振明），＜河南省孟縣出土北魏司馬悅墓志＞，《考古》，1983年3期，頁279～81。
13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徐殿魁），同註53，頁818～31。
139. 洛陽博物館，＜河南洛陽北魏元義墓調查＞，《文物》，1974年12期，頁53～55。
140. 偃師商城博物館（王竹林），＜河南偃師兩座北魏墓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5期，頁414～25。
141. 偃師商城博物館（王竹林），同註140，頁414～25。
142. 洛陽博物館（黃明蘭），＜洛陽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4期，頁218～24轉243。
143. 李德方，＜孟津縣北陳村北魏壁畫墓＞，《中國考古學年鑑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頁232～33。
144. 孟昭林，＜記後魏邢偉墓出土物及邢璧墓的發現＞，《考古》，1959年4期，頁209～10。
145. 張季，同註63，頁28～37。
146. 河北省滄州地區文化館（王敏之），＜河北省吳橋四座北朝墓葬＞，《文物》，1984年9期，頁23～38。
147. 大同市博物館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臺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1983年8期，頁1～4。
148. 代尊德，＜太原北魏辛祥墓＞，《考古學集刊》1期（1981），頁197～202。
149. 淄博市博物館等（張光明等），同註106，頁216～21。
150. 崔漢林等，＜陝西華陰縣北魏楊舒墓發掘簡報＞，《文博》，1985年2期，頁4～11。此外，同墓出土的所謂黑釉盤口瓷瓶從造型看來頗似南方青瓷。
151. 長谷部樂爾，＜魏晉南北朝の陶磁＞，《世界陶磁全集》卷10（東京：小學館，1982），頁241。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此，在並未發現北方該一時期窯址可供比對的現狀下，就出現了北魏晚期說、[152]東魏初年說、[153]東魏說[154]以及曾經一度流行的北齊說等不同的看法。

就揭載有圖版的六世紀北魏墓出土青瓷而言，司馬悅和楊舒兩墓所出唾壺造型與湖南資興梁普通二年（520年）墓（M413）[155]或南京蔡家塘墓（M1）、[156]仙鶴門墓[157]等南朝作品頗爲類似，有可能來自南方。太原辛祥墓出土的帶把鷄頭壺，把端所飾龍首迺勁有力，於白胎上施罩透明淡青釉，筆者曾懷疑係北方所燒造，[158]而與辛祥墓鷄頭壺造型、胎釉呈色均極相似的同式壺還可於見偃師聯體磚廠2號墓出土作品，兩墓的鷄頭壺均於壺肩置複式橋形繫，鷄嘴上下張合，與南方一般常見的圓管狀鷄嘴有所不同，不過聯體磚廠2號墓另伴隨出土了胎釉與鷄頭壺一致的蓮瓣紋碗（同圖32），後者則與江西吉安南齊永明十一年（493年）墓同式碗極爲類似[159]（圖35），故辛祥墓等北方出土青瓷的產地仍然未能解決。偃師華染墓青瓷燭台造型較爲特殊，由一字排列的五管插下置覆蓮承台，台下設蟾形座。從福建省博物館藏同省閩侯南嶼出土的人物騎蟾雙管插器，[160]或浙江紹興出土的獅座帶管燭台等南朝青瓷看來，[161]該類以動物爲底座的帶管燭台是南朝流行的造型之一；江西永豐南朝墓亦曾出土多管式覆蓮座燭臺。[162]墓葬之外，北魏洛陽城內亦出土了部分報告書推測或是北方燒製的青瓷，[163]不過所出作品造型均見於南方青瓷，如飾有蓮花瓣的盞托即與前述江西吉安南齊紀年墓作品完全一致[164]（圖36），後者無疑又是南方所生產。因此，儘管出土資料當中亦存在若干間接的線索似可提示北方或於六世紀二、三十年代可能設窯燒造青瓷，[165]但終究止於臆測的階段，而該一情況延續至東魏墓出土青瓷仍未獲得改善。西元535年北魏正式分裂爲東魏和西魏，相對於

152. 如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163。
153. 鄭紹宗，〈河北省考古工作概述〉，《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同註110），頁56；馮先銘，〈新中國陶瓷考古的主要收獲〉，《文物》，1965年9期，頁29。
154. 矢部良明，同註1，既推測北魏元義墓（526年）出土青瓷或爲北方所產（頁60），但又認爲東魏高長命墓（547年）的青瓷碗或爲北方早期青瓷，而可確認的北方青瓷則屬北齊封子繪墓（565年）出土的蓮花尊（頁92）。
155. 湖南省博物館(傅舉有)，〈湖南資興晉南朝墓〉，《考古學報》，1984年3期，圖版拾陸之5。
156. 金琦，〈南京甘家巷和童家山六朝墓〉，《考古》，1963年6期，頁307圖十三；另童家山一號墓（頁307圖十四之3）參照。
157. 南京市博物館(易家勝)，〈南京郊區兩座南朝墓〉，《考古》，1983年4期，頁332圖六之4。
158. 拙稿，〈鷄頭壺的變遷——兼談兩廣地區兩座西晉紀年墓的時代問題〉，《藝術學》7期（1992），頁15。
159. 平江等，〈江西吉安縣南朝齊墓〉，《文物》，1980年2期，圖版陸之4。
160.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福建陶磁》中國陶瓷全集第27冊（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十美乃美，1983），圖41。
161.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越窯》中國陶瓷全集第4冊（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十美乃美，1981），圖117。
162. 彭適凡，〈江西永豐出土一批青瓷器〉，《文物》，1964年1期，頁55圖二。
16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杜玉生），〈北魏洛陽城內出土的瓷器與釉陶器〉，《考古》，1991年12期，頁1094。
164. 平江等，同註159，圖版陸之3。
165. 如矢部良明，同註1，頁60曾指出洛陽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元義墓出土的青瓷碗足既綫又寬的做法並不見於南朝青瓷。

西魏墓至今未有出土青瓷的報導，東魏墓則出土不少青瓷，集中出土於都城所在地的河北另山東地區，其中部份墓葬並伴隨出土了黑褐釉作品。出土青瓷的東魏墓包括：河北河間興和三年（541年）邢晏墓（唾壺、碗）、[166]吳橋興和三年至武定四年（541－46年）封柔夫婦墓（盤口壺、蓋罐、碗）[167]（圖37～38）、吳橋興和三年至武定二年（541－44年）畢氏及其夫墓（盤口壺、蓋罐、碗）、[168]贊皇興和二年至武定二年（540－44年）李希宗夫婦墓（罐、碗）、[169]磁縣武定五年（547年）趙胡仁墓（細頸瓶）、[170]景縣武定五年（547年）高長命墓（碗）、[171]磁縣武定八年（550年）茹茹公主墓（蓋罐）[172]（圖39）、吳橋2號墓（碗）、[173]以及山東淄博元象元年（538年）崔混墓（蓋罐、碗）[174]（圖40）、高唐興和三年（524年）房悅墓（碗）、[175]壽光北魏孝昌元年至東魏武定二年（524－44年）賈思伯夫婦墓（罐、碗）、[176]淄博第16號墓（鷄頭壺）等。[177]其中，河北吳橋封柔夫婦墓和畢氏及其夫墓，兩墓所出青瓷種類及作品本身的造型、裝飾特徵極爲一致，可能爲同一墓葬。[178]此外，元象元年崔混墓的青瓷四繫罐造型與北方隋唐時期流行的同式罐頗爲接近，[179]亦曾見於同省隆莊中陳郝瓷窯址二期（隋至初唐）作品，[180]若非混入，則可做爲隋唐同式罐的最早祖型，值得留意。比起北魏晚期墓，東魏墓青瓷種類增多了盤口壺、長頸瓶和各式帶繫罐，其餘則大體相當，並仍存在極難區分南北產地的作品。研究者們亦曾涉及東魏墓出土青瓷的產地問題，如馮先銘氏認爲畢氏墓青瓷作風與南朝作品迥然不同；[181]鄭紹宗氏亦主張河北邢晏、封柔、畢氏等墓青瓷均爲北方所產；[182]長谷部樂爾氏則以爲封柔、趙胡仁墓作品均屬南方青瓷。[183]此外，矢部良明氏既主張畢氏墓、封柔墓作品是來自南方，同時認爲山東房悅、

166. 河北省博物館等，同註110，頁55～56。
167. 河北省博物館等，同註110，頁56；另李知宴，〈三國兩晉南北朝製瓷業的成就〉，《文物》，1979年2期，頁52所載線繪圖。
168. 張平一，〈河北吳橋縣發現東魏墓〉，《考古通訊》，1956年6期，頁42～43。
169. 石家莊地區革委會文化局文物發掘組，〈河北贊皇東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6期，頁382～90轉372。
170.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陳村東魏墓〉，《考古》，1977年6期，頁394～400轉428。
171. 河北省文管處（何直剛），同註58，頁17～31。
172. 磁縣文化館（朱全閣等），〈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4期，頁1～9。
173. 河北省滄州地區文化館（王敏之），同註146，頁23～38。
174.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蘇玉瓊等），〈臨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學報》，1984年2期，頁221～43。
175. 山東省博物館文物組（夏名采），同註59，頁105～9。
176. 壽光縣博物館(賈效孔等)，〈山東壽光北魏賈思伯墓〉，《文物》，1992年8期，頁15～19。
177. 淄博市博物館等（張光明等），同註106，頁216～21。
178. 矢部良明，同註1，頁67；筆者亦有同樣疑慮。
179. 參見智雁，〈隋代瓷器的發展〉，《文物》，1977年2期，頁57圖一。
180. 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等（劉鳳君等），〈山東隆莊中陳郝瓷窯址〉，《考古學報》，1989年3期，頁372圖10之3。
181. 馮先銘，同註153，頁26。
182. 鄭紹宗，同註110，頁55～56。
183. 長谷部樂爾，同註151，頁242。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河北高長命所出者係北方青瓷。　儘管上述說法均未提示足以令人信服的確鑿依據，不過卻也反映了一個可能的事實，即若真存在有東魏青瓷，那麼其無疑是倣自南方青瓷，並且具有南朝風格。

筆者無意在充斥著不確定因素的條件下針對作品進行抽象的產地揣測，不過山東賈思伯夫婦墓出土的造型略顯修長，形制特殊的四繫罐卻值得加以留意（圖41）。賈氏夫婦二人歿葬時代相距二十年，但從該墓伴隨出土的陶盒與同省淄博東魏元象元年（538年）崔混墓作品完全一致等情形看來，[185]墓葬出土陶瓷應是東魏武定二年（544年）合葬時所埋入。賈氏夫婦墓青瓷四繫罐造型於北方前所未見以後又不見發展，然而卻常見於兩廣地區南朝墓，[186]並且是該地六朝迄唐墓出土陶瓷中的重要器類之一。如果這一判斷無誤，則東魏墓出土青瓷中或許還包括少數來自兩廣地區所燒造的作品，結合淄博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崔猶墓出土的素燒雙繫罐造型[187]（圖42）亦與廣東揭陽南朝墓[188]同類作品一致等情形看來，山東與嶺南之間的可能交往頗耐人尋味。事實上，相對於北方晉墓出土青瓷多來自浙江瓷窯所生產，六世紀北魏、東魏墓所出推測屬南方青瓷的作品，則多與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南朝墓作品更爲接近，後者亦經常於灰白胎上施罩透明淡青或略呈綠色調釉，其與所謂北方青瓷胎釉的微妙區別很難從報告書的文字描述中具體掌握。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東魏墓除出土青瓷之外，有的還伴隨有黑褐釉作品，其中河北趙胡仁墓的一批醬釉作品就器形而言，無疑是北方所產，而同墓出土的青瓷帶頸瓶造型基本不見於南朝陶瓷，但卻與同墓的醬褐釉細頸瓶作風有類似之處，極有可能是北方所產。此外，近年發掘的著名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瓷仰覆蓮蓋罐（同圖39），蓋面所飾複瓣的浮雕蓮瓣與目前所見南朝作品不同，而與北朝石窟蓮瓣紋飾或同墓出土的陶座上裝飾的蓮瓣裝飾基本一致，[189]至於飾有浮雕覆蓮瓣的罐身雖亦見於南朝青瓷，但與可確定屬北方所產的北齊墓出土的同式罐一脈相承更爲接近，很可能是北方青瓷窯廠所生產。六世紀前期北方墓葬出土青瓷南北產地不易區分的情況至北齊時有了顯著的改善，使得研究者終於逐漸地掙脫出只能經由個別作品的間接比對所得不確定訊息的無助窘境。

184. 矢部良明，同註1，頁65～69。
185.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蘇玉瓊等），同註174，頁230圖十一之3。
186. 如始興縣博物館（廖晉雄），＜廣東始興縣晉、南朝、唐墓清理簡報＞，《考古》，1990年2期，頁121圖五之1～3。該一現象值得留意,如近年楊泓氏考察山東北齊崔芬墓的壁畫風格亦認爲其倣自南朝,主張山東地區應是南北文化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地區之一，見同氏＜南北朝墓的壁畫和拼鑲磚畫＞，《中國考古學論叢》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3），頁436。
187. 淄博市博物館等（張光明等），同註106，圖版肆之1。
188. 廣東省博物館等（楊耀林等），＜廣東揭陽東晉、南朝、唐墓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10期，頁901圖九之2。
189. 磁縣文化館（朱全開等），同註172，頁6圖八之9。

(三)北方青瓷的發展

出土有青瓷的北周墓極爲少見，目前僅知陝西咸陽國際機場北周墓出土有青瓷四繫罐、瓷壺或瓷唾壺等作品，從筆者實見及相關圖錄所載少數北周墓青瓷看來，胎色灰白堅緻，釉色青黃透明帶開片，有淚痕，個別作品如青瓷碟，碟內側押印菊瓣紋，並於碟心飾陽紋印花草葉紋和三組走獸，整體作風與西方的金銀器皿頗有共通之處（圖43），不過正式報告尚未公佈，詳情不得而知。[190]相對的，由高洋建立的北齊雖僅存活二十七年，其窯業的發展卻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爲了行文的方便並期能較清晰地傳達北齊青瓷的發展情況，首先有必要略嫌繁瑣的將出土青瓷的北齊墓綜合羅列如下。它們分別是河南武平六年（576年）范粹墓（碗、盅）、[191]武平七年（576年）李雲墓（罐）[192]（圖44）、天統四年至武平四年（568－73年）和紹隆夫婦墓（唾壺）、[193]沁陽縣墓（鷄頭壺、碗）、[194]南樂縣墓（鷄頭壺、罐、缽）、[195]河北太寧二年（562年）司馬氏太夫人墓（碗）、[196]河清四年（565年）封子繪（唾壺、盤、蓮花尊）[197]（圖45）、天統二年（566年）崔昂墓（唾壺、罐、碗、盤）[198]（圖46～48）、天統三年（567年）堯峻夫婦墓（高足盤、壺、帶頸罐）、[199]武平二年（571年）常文貴墓（碗）、[200]武平七年（576年）高潤墓（鷄頭壺、蓋罐、帶頸罐、燭台、碗）、[201]景縣祖氏墓（蓮花尊）、[202]吳橋3號墓（碗）、4號墓（碗）、[203]灣漳壁畫墓（帶頸罐）；[204]山西天統三年（567年）韓裔墓（鷄頭壺、盤、盒）[205]（圖49）、武平元年婁叡墓（盤、瓶、罐、鷄頭壺、高足

190. 參見：＜咸陽國際機場北周墓群＞，《中國考古學年鑑1989》，頁259；＜咸陽國際機場漢、北周、唐代墓葬＞，《中國考古學年鑑1991》，頁312。均未正式發表。不過該墓群出土的青瓷彩圖可參見：香港區域市政局等，《物華天寶－－唐代貴族的物質生活》（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等，1993），圖39～41。
191. 河南省博物館，同註60，頁47～57轉86；安陽文教衛生管理站，同註60，頁45～47。但前者將出土的碗視爲白瓷。
192. 周到，同註61，頁482～84。
19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李季萍等），＜安陽北齊和紹隆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中原文物》，1987年1期，頁8～16。
194. 鄧宏里等，＜沁陽縣西向發現北朝墓及畫像石棺床＞，《中原文物》，1983年1期，頁4～13。
195. 史國強等，＜河南南樂出土北朝文物＞，《文物》，1988年5期，頁92～93。
196.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敖承隆），＜河北磁縣講武城古墓清理簡報＞，《考古》，1959年1期，頁24～26。
197. 張季，同註63，頁28～37。
198. 河北省博物館等（唐雲明等），＜河北平山北齊崔昂墓調查報告＞，《文物》，1973年11期，頁27～33。
199. 磁縣文化館(朱全升)，＜河北磁縣東陳村北齊堯峻墓＞，《文物》，1984年4期，頁16～22。
200. 滄州地區文化局王敏之，＜黃驊縣北齊常文貴墓清理簡報＞，《文物》，1984年9期，頁39～42。
201. 磁縣文化館，同註64，頁235～43轉234。
202. 張季，同註63，頁28～37。
203. 河北省滄州地區文化館（王敏之），同註146，頁23～38。
20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鄴城考古工作隊等（徐光冀等），＜河北磁縣灣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7期，頁601～7轉600。
205. 陶正剛，＜山西祁縣白圭北齊韓裔墓＞，《文物》，1975年4期，頁64～73。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杯、托、碗、盒)㉖(圖50～52)，太原壁畫墓(鵪頭壺)；㉗山東天保元年(550年)崔芬墓(鵪頭壺、碗、罐)、㉘天統元年(565年)崔德墓(高足盤、碗)、㉙武平二年(571年)道貴墓(碗)、㉚武平四年(573年)崔博墓(高足盤、碗)、臨淄6號墓(蓋)、9號墓(高足盤)、㉛淄博和莊墓(碗)等。㉜就上述北齊墓出土青瓷而言，其種類比六世紀前期北方墓葬青瓷作品明顯增多，出現了盒、燭台、高足杯、高足盤以及具有強烈時代特徵的蓮花尊等器形，個別墓葬出土數量亦較多，特別是如婁叡墓出土青瓷達數十件。截至目前，經由正式報導的北齊墓計有三十餘座，其中三分之二的墓葬都出土了青瓷，不難想見青瓷於當時已較普及，並且流行於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等廣大地區。雖然過去已有部分中國方面的研究者根據其親身見聞或窯址的實際考察，認爲河南安陽、鞏縣；河北磁縣、曲陽縣、陳留莊；安徽壽州、山東淄博等地都曾發現北朝末窯址。㉝更有學者明確指出河南李雲、范粹墓作品來自安陽相州窯；㉞河北高潤墓的青瓷Ⅰ式碗係同省磁縣賈壁村窯所燒造，㉟然而若就經正式報導的窯址發掘資料看來，只有山東淄博寨里和同省棗莊中陳郝村等兩地瓷窯早期作品可確認上溯北朝晚期。㊱前者所見碗、缽造型和施半截釉的作風與部分北齊墓同類作品有共通之處，帶繫罐之繫耳造型也與河北崔昂墓作品極爲類似；而後者中郝莊瓷窯址所見碗類已由報告書所指出，其與淄博崔氏墓所出作品頗爲一致。

儘管北齊墓出土青瓷當中亦包括少數疑似南方青瓷卻又難確認產地的作品，如景縣封氏墓唾壺就與前述推測或爲南方青瓷的陝西華陰北魏熙平二年(517年)楊舒墓所出唾壺造型頗爲類似㊲(同圖34)；同封氏墓群的四繫蓋罐亦見於南方青瓷。㊳此外，與被視爲北齊青瓷最高成就的封子繪墓的大型蓮花尊相似的同墓出土青瓷殘片，雖經化學

20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同註66，頁1～23。根據報告書的記載，該墓計出土黃線釉瓷器75件，不過李知宴同註47，頁107認爲同墓的青釉墊應是鉛釉陶，均還有待日後查證。
20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渠川福)，＜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文物》，1990年12期，頁1～10。
208. 吳文祺，＜臨朐縣海浮山北齊崔芬墓＞，《中國考古學年鑑1987》(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174。
209.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蘇玉瓊等)，同註174，頁221～43。
210. 濟南市博物館(韓明祥等)，＜濟南市馬家莊北齊墓＞，《文物》，1985年10期，頁42～48轉66。
211. 以上三墓均見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蘇玉瓊等)，同註174，頁221～43。
212. 淄博市博物館等(張光明)，同註62，頁64～67。
213. 如李知宴，同註167，頁50認爲河南安陽、河北貫壁瓷窯上限可能到北朝晚期；楊文山，＜隋代邢窯遺址的發現和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12期，頁55推測陳劉莊邢窯窯址可上溯北周；安金槐，《中國考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563稱河北磁縣貫壁、河南安陽北關、鞏縣小黃冶等窯址均可上溯北朝；秦大樹，＜河北省磁縣觀兵台古瓷窯遺址調查＞，《文物》，1990年4期，頁35亦提及河北北貫壁、青碗窯和白土等處瓷窯曾發現與鄴城出土的北朝青瓷片相同的作品。壽州窯參見：胡悅謙，＜談壽州瓷窯＞，《考古》，1988年8期，頁749。
214. 趙青雲，＜河南古代瓷器的創燒與發展＞，《河南古瓷窯址資料匯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編，1985)，頁6；另同氏同註115，頁220。
215. 磁縣文化館，同註64，頁243。
216. 山東淄博陶瓷史編寫組等(王恩田)，同註71，頁352～59；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等，同註180，頁363～86參照。
217. 崔漢林等，同註150，圖版壹之3。

測定得出結果應係北方青瓷，㊴然而由於南京麒麟門外靈山亦出土了造型、裝飾頗爲類似的青瓷蓮花尊，㊵尤可注意的是，近年朝鮮半島百濟王宮里廢寺金堂跡及五層石塔之間亦出土了與封氏墓蓮花尊完全一致的青瓷片。由於目前可確認的百濟遺跡出土青瓷均爲中國南方所生產，其次考慮到百濟與南朝的密切交往，故其確實的產地顯然有待進一步的探討。㊶不過北齊墓出土青瓷多數均可判明係北方所產，而前述咸陽國際機場北周墓青瓷作品無疑亦來自北方窯場，雖然其具體窯口至今不明，但其造型或裝飾作風已與南方青瓷有別。就其種類而言，婁叡墓的貼花壺、盒、高足杯(同圖50～52)，高潤墓的燭台，河北灣漳、堯峻等墓的敞口帶頸罐以及淄博崔氏墓的高足盤等器形基本不見於南方青瓷，無疑是北方所生產。其次，如韓裔墓、高潤墓出土的鵪頭壺(同圖49)或李雲墓、崔昂墓的帶繫罐(同圖44、46)等南北兩地共同持有的造型，則可經由作品細部造型和附加裝飾等線索輕易地劃分南北產地；特別是繫耳的造型、裝飾圖案的內容及模印貼花的技法等方面，南北青瓷之間呈現出較爲明顯的差異。限於篇幅，本文不擬逐一列舉詳盡敘述，不過相對於南北青瓷間存在的差別，北齊青瓷則經常與同一時期北方墓葬出土的鉛釉陶或素陶器等可確認屬北方所產陶瓷造型有許多共通之處。如河北灣漳、堯峻、高潤等墓出土的帶頸瓶既與灣漳墓伴出的陶瓶造型一致，也與河南范粹墓出土的著名白瓷同式瓶大體相同；婁叡墓蓋盒亦與庫狄洛墓的鉛黃釉盒(同圖20)或范粹墓陶盒基本相同。結合范粹墓白瓷帶繫罐(同圖22)亦與同墓伴出的鉛釉二彩罐造型一致，以及河北崔昂墓(圖53)所出目前不見於南方陶瓷的黑褐釉帶繫罐之造型和釉色與同省東魏趙胡仁墓(圖54)出土作品極爲類似等情形看來，可以認爲北齊窯業在繼承東魏的傳統並汲取南朝陶藝要素的同時，業已初步地確立了北朝陶瓷的特有樣式，而該一樣式則成爲隋唐陶瓷的主要淵源之一。

四、六世紀北方窯業的傳承與動向

六世紀是中國陶瓷史上饒富趣味的重要階段，特別是北方窯業的諸多成就，對後世瓷窯有極爲深遠的影響。在這一時期當中，北方窯業既繼承、發展了北魏以來的鉛釉傳統，並且成功地燒造出目前可確認的中國第一件白瓷器；㊷著名的北方青瓷和黑瓷也是

218. 從圖版觀察，該四繫蓋罐無疑是南方輸入的作品，並且年代或可上溯東晉。除了繫耳的數目及安置方向等極小差異之外，器蓋及罐身造型均與江西新淦5號東晉墓(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西新淦金鷄嶺晉南朝墓＞，《考古》，1966年2期，圖版柒之2)、江蘇鎮江19號東晉墓(鎮江博物館劉建國，＜鎮江東晉墓＞，《文物資料叢刊》8期(1983)，圖版參之20)等青瓷蓋罐一致。如果該一推測無誤，則說明了其曾經一度傳世而後入壙。而報告極爲簡略的封氏墓群亦有重新梳理的必要。
219. 周仁等，＜中國歷代名窯陶瓷工藝的初步科學總結＞，《考古學報》，1960年1期，頁101。
220. 南京博物院編，《江蘇六朝青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圖105。
221. 崔孟植等，＜王宮里廢寺(官宮寺)の發掘＞，《佛教藝術》207期(1993)，頁104圖54參照，但該報告誤將此一珍貴青瓷殘片定爲隋代作品。此外，長谷部樂爾氏，同註151，頁242亦曾指出，由於南京靈山作品的出土，故封氏墓青瓷蓮花尊的產地有待檢討。

臺灣大學博物館 期刊資料庫

誕生於該一時期。

筆者認爲，要究明北方六世紀窯業的生產狀況，可以先從出土陶瓷的器形和裝飾等兩方面著手進行。除了鉛釉之外，目前可確認屬北方窯廠所生產的六世紀施釉陶瓷之年代，分別屬於東魏、北齊、北周和稍晚時期的隋代。就東魏、北齊墓出土的青瓷、白瓷、鉛釉、黑褐釉等北方陶瓷的器形種類而言，計有碗、杯（含高足杯）、盤（含高足盤）、缽、盂、盒、鐎斗、龍首三足器座、長頸瓶、粗頸瓶、玉壺春式瓶、燭台、燈台、帶繫罐（含三繫、四繫、六繫及帶蓋者）、盤口壺（含帶繫者）、短頸鼓肩罐、蓮花尊、貼花壺、鵝頭壺、獸柄壺、扁壺、唾壺和虎子等。其中四繫盤口壺、帶繫罐（四繫、六繫及帶蓋者）、盂、鵝頭壺、唾壺、虎子等造型特徵明顯的器形均見於南方青瓷，後者的相對年代亦較北方早。其次，推測應屬南方輸入的五世紀末至六世紀中期以前北魏墓出土青瓷亦包括有鵝頭壺和唾壺等作品，而鵝頭壺和唾壺正是六世紀北方施釉陶瓷的主要器形之一。相對於前述山東東魏興和三年（542年）房悅墓的褐釉虎子（同圖18）是經報導的北朝墓中僅有的孤例，於南方則頗爲流行，不過除了福建地區南朝墓之外，其餘省份虎子的存在時代均集中於孫吳至東晉時期，至南朝已經基本絕跡。[223]因此，除了房悅墓虎子不能如過去研究者將之簡單地歸結於是對南朝陶瓷的直接模倣，[224]其餘作品造型既見於稍早時期的南方陶瓷，明示了北方地區是從輸入南方青瓷，進而開始模倣，最後才燒製出具有北方樣式特徵的作品。值得留意的是，山西大同北魏永平元年（508年）元淑夫婦墓出土了應屬北方所生產的獸柄盤口陶壺（圖55）、六足陶硯（圖56）和石製托杯和托盤。[225]從六足陶硯明快銳利的造型特徵看來，不能排除有倣自金屬器的可能，但無論如何其原型無疑是來自南方青瓷；獸首柄陶壺的獸柄意匠近亦來自東晉、南朝以來的帶把鵝頭壺，托杯也是東晉南朝流行的器形之一。元淑墓出土的陶器是目前北朝自製陶瓷中具有明確南朝樣式的時代最早作品，更是北方同式作品的最早紀年實例。這不僅說明北方地區於六世紀初期已曾受到南朝陶瓷的影響，亦爲山東淄博東魏崔氏墓（M7）以及河北東魏天平四年（537年）高雅墓出土的白陶或黃褐釉同式獸柄壺找到了直接的源頭；[226]該式壺直至山西隋開皇十五年（595年）梅淵墓中仍可見到。[227]其次，目前可確認屬六世紀北方施釉陶瓷的最早紀年實物是前述東魏高雅墓出土的黃褐釉獸柄壺、黃釉罐和醬釉罐、碗（同圖14～16），次則爲山東東魏房悅墓的青釉

222. 這裏是指目前學界所公認的作品而言，不包括如百濟武寧王陵（525～29年）出土的還有爭議的作品。有關白瓷起源研究現況的簡短介紹可參見拙稿，＜關於中國白瓷起源的幾個問題＞，《故宮文物月刊》42期（1986），頁133～36。
223. 拙稿，＜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初步探討＞，《故宮學術季刊》，6卷3期（1989），頁53。
224. 如矢部良明，同註1，頁91認爲房悅墓虎子是倣自南朝陶瓷。
225. 大同市博物館，＜大同東郊北魏元淑墓＞，《文物》，1989年9期，頁60圖八之1、3；頁62圖十六等。
226. 崔氏墓作品見：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蘇玉瓊等），同註174，圖版貳陸之5；高雅墓作品見：河北省文管處（何直剛），同註58，頁24圖七之1。
227. 山西省博物館等(張德光)，〈山西汾陽北關隋梅淵墓清理簡報〉，《文物》，1992年10期，頁25圖五。

碗、黃釉壺、盒、燈及醬釉虎子（同圖18）、鐎斗、唾壺、燈、龍首器架等作品。上述作品當中，除了房悅墓的青釉碗之外，其餘均屬鉛釉陶器。出土資料使得我們有理由相信，北方的陶工在進行倣製南朝陶瓷時曾經以素陶或其傳統的鉛釉爲之，並且有可能利用鉛釉的技術首先開始有意識的倣燒南朝青瓷，直到掌握到青瓷燒造技術之後仍未放棄其具有悠久傳統且最爲熟悉的鉛釉技法，並將後者發揚光大。該一情況既可在東魏、北齊模倣南方青瓷作品中，同時存在造型基本一致的青瓷和鉛釉陶一事得到印證，對於思考目前仍曖昧不明的北方早期白瓷與鉛白釉之間的可能關係，亦可提供重大的啟示。事實上，著名的山西武平元年（570年）婁叡墓的二彩盂（同圖23）或河南武平年間李雲、范粹墓出土的二彩帶繫罐等鉛釉作品（同圖22），不僅器形倣自南朝青瓷，其釉彩裝飾的契機亦是來自流行於南方的青瓷褐斑裝飾。換言之，北朝的陶工是以其嫻熟的鉛釉陶燒造技術來完成對於青瓷裝飾效果的追求。鉛釉陶至北齊時有了高度的發展，胎釉亦漸趨潔白清澄，其結果正如水野清一氏所說的，無形中奠定了唐三彩的基盤。[228]究其淵源，南朝青瓷對於促使北方鉛釉陶的進一步發展，功不可沒。

另一方面，北方六世紀墓葬出土的施釉瓷中亦包括部份基本不見於南方，或雖屬同一器類但造型與南方青瓷有別的盒、燭台、燈台、細長頸瓶、粗頸瓶、短頸鼓肩壺、貼花壺、扁壺、玉壺春式瓶或帶有凸弦紋裝飾的碗。所謂玉壺春式瓶目前只見於河北景縣北齊封子繪墓，但於山東淄博寨里窯址出土有同類標本，[229]是北朝新興的器形之一。矢部良明氏曾經指出，北朝墓出土的盒、長頸瓶、鐎斗和個別碗類等陶瓷，應是倣自當時北方流行的金屬器造型，扁壺的祖型則可能源自西亞或西域，進而認爲金屬器及南方陶瓷的造型構成了北朝後期施釉陶瓷的主要內容。[230]基本上確是如此，從前述咸陽國際機場北周墓青瓷印花碟以及河北灣漳壁畫墓出土的三足陶鼎爐上亦可輕易地觀察到金屬器的某些特徵，[231]不過北魏洛陽城內大市遺跡出土的黑釉碗和盂，於器外壁刮釉劃出弦紋的裝飾（圖57），以及於碗壁飾凸起乳釘狀紋的醬釉碗等作品則可以肯定是倣自西方的玻璃器。[232]與後者乳釘狀飾碗裝飾作風一致的薩珊王朝的玻璃器，亦曾於日本京都上賀茂神社本殿遺跡出土；[233]寧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李賢夫婦墓也出土了同式進口玻璃碗。[234]因此，除了金屬器之外，西方傳來的精美玻璃器皿無疑也是北朝陶工的模

228. 水野清一，同註56，頁165。
229. 山東淄博陶瓷史編寫組（王恩王），同註71，頁353圖一之9及頁256。該一器形於北方隋唐陶瓷中亦經常可見。
230. 矢部良明，同註1，頁96～102參照。
23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鄴城考古工作隊等（徐光冀等），同註204，頁607圖四之1、2。
23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杜玉生），同註163，頁1093圖二之2、3、8；另圖版參之4、5。
233. 深井晉司，＜東西交涉史研究における諸問題——所謂イラン高原出土の円形切子裝飾瑠璃碗の研究を中心に＞，《美術史論叢》（東京大學）1期（1984），頁1～17。
234. 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韓兆民），＜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婦墓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11期，圖版參之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倣對象。有關北朝陶瓷與金屬器之間的關係，還可由前述山東東魏房悅墓出土的褐釉虎子得到進一步的證實（同圖18），從南方青瓷虎子的存在時代而言，兩者不太可能有直接的影響或模倣關係。相對的，流傳於世的作品中則存在推測屬北朝時期的銅虎子，[235]其造型與房悅墓作品有共通之處，也與河北北齊天統二年（566年）崔昂墓銅虎子一脈相承，[236]說明銅製虎子一度流行於北朝，其祖型可上溯至遼寧北票太平七年（415年）馮素弗夫婦墓的銅虎子。[237]儘管後者的初出淵源目前不明，不過房悅墓的褐釉虎子係倣自北方流行的同型金屬器則無疑義。就這點而言，福建南朝墓所見細部造型與浙江越窯系晉代青瓷不同而具有明快銳利作風的青瓷虎子，也有可能是倣自金屬器。

此外，房悅墓出土的黃釉盤口細頸壺的造型（同圖17）則可於山西大同市城南北魏1號墓的陶壺找到淵源[238]（圖58），與後者類似的陶壺於內蒙呼和浩特北魏墓中亦有出土，[239]是未見於南朝而流行於北魏的器形之一。河南偃師熙平元年（516年）元睿墓[240]或洛陽武泰元年（528年）元邵墓[241]出土的陶高柄燈器亦可視爲是山西北齊婁叡墓青釉燈台的祖型（圖59），其淵源直可上溯至北方魏晉墓，[242]除了造型的些微變化之外，不同的只是婁叡墓的青釉作品還增添了帶有佛教色彩的蓮瓣紋飾，這種蓮花形燈柄造型既見於龍門藥方洞束蓮柱，亦流行於響堂山、天龍山的北齊石窟中。其次，河北東魏高雅墓（537年）和趙胡仁墓（547年）出土的黑褐釉短頸鼓肩壺（同圖14）造型既見於山西大同134號北魏墓[243]（圖60），也可輕易的於遼寧朝陽後燕崔遹墓（395年）[244]或北票北燕馮素弗墓（415年）[245]等北方早期墓葬出土陶器上尋得原型。該式壺曾傳至北周，[246]並流行於唐代，成爲唐代白瓷、花釉、素陶加彩或唐三彩的重要器形之一。

綜觀北方六世紀墓葬出土陶瓷，不難看出對其窯業起推進作用的因素，除了南朝陶藝的影響，以及其他材質工藝品如金屬器或外來玻璃器的模倣並汲取佛教文化中的若干要素之外，其對於拓跋鮮卑或北方傳統陶器的繼承與改良亦不容忽視。其中又以對南朝青瓷的模倣不遺餘力，影響也最爲直接和巨大，並且集中地反映在施釉陶瓷之上，至於未施釉的低溫陶器則多仍承襲北方傳統造型持續生產。值得一提的是，施釉陶瓷的器形多數與南朝造型有關，以北方傳統造型進行施釉的作品爲數較少，後者還與造型相同的

235. 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六朝の美術》（東京：平凡社，1976），圖156；其餘散見類似例可參見：池田厚史，同註127，頁207圖74。
236. 河北省博物館等（唐雲明等），同註198，頁29圖二。
237. 黎瑤渤，同註26，圖版肆之5。
23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同註51，頁6圖十三之8；圖版壹之4。
239. 內蒙古博物館郭素新，＜內蒙古呼和浩特北魏墓＞，《文物》，1977年5期，頁40圖五。
24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徐殿魁），同註53，頁822圖四之7等。
241. 洛陽博物館（黃明蘭），同註142，頁222圖九之1。
242. 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趙芝荃等），同註7，頁728圖十一之10、11。
24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同註51，圖版壹之2。
244. 陳大爲等，同註45，頁272圖六之1。
245. 黎瑤渤，同註26，頁20圖六之二三。
246.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李德方），＜洛陽澗水東岸發現一座北周墓葬＞，《中原文物》，1984年3期，頁54圖二之2。

無釉陶器同時存在於這一時期墓葬之中。相對於南方六世紀時梁、陳兩代窯業基本只是固守自東漢以來青瓷和黑釉傳統，青瓷的燒造亦遜於吳晉時期作品，後繼乏力，北方則在這一世紀中，汲取了以南方青瓷爲主的各方因素，從初期的摸索到東魏時的萌芽醞釀，至北齊時終於確立了其樣式，充滿了活潑、進取的旺盛生命力，奠定了其在陶瓷史上不移的地位。就目前的出土資料看來，以北齊武平年間（570－75年）達到了窯業的最高峰，至楊堅廢北周建立隋朝（581年），北方窯業仍是繼承該一傳統平緩地發展。雖然目前未見隋代二彩鉛釉陶出土的正式報導，[247]不過從西安隋開皇十二年（592年）呂武墓出土的綠釉燭台得知，[248]鉛釉陶的燒造技術仍未斷絕，並於唐代得到空前的發展；安陽隋開皇十五年（595年）張盛墓出土的白瓷黑彩俑，[249]更是繼五世紀末（484年）司馬金龍夫婦墓、陝西長安縣北朝墓以來，再度出現的施釉俑類。上述墓葬墓主等級均較高，說明該一期間施釉俑類仍屬高檔明器。

汲取融合多方要素的六世紀北方陶藝傳承於七世紀隋唐時期仍持續的發展，其既是隋唐陶瓷的主要淵源之一，同時經過盛唐時期的進一步提昇和開展，遂將該一傳承推向另一個高峰。限於篇幅兼及本文的主要論題，筆者不擬對六紀北方陶瓷給予隋唐陶瓷的影響進行詳細的考察和比對。但大體而言，做爲唐代陶瓷主要施釉種類的白瓷、青瓷、黑褐釉、低溫鉛釉等均源於該一傳統。其次，陶瓷作品上的貼花或多彩色釉裝飾，前者雖與當時金銀器流行的裝飾有關，後者亦可能從染纈或彩色玻璃器上得到若干啟示，然具有類似裝飾意匠的作品可上溯北齊時期陶瓷作品。至於器形的傳承，除了前述所謂萬年壺之外，如扁壺、鵝頭壺、粗頸壺、四繫罐、托盤、細長頸瓶、高足盤、高足缽、盒及部份碗盅類等器形均與北朝同類作品有著明顯的承襲演變的關係。結合流行於隋唐時期的隧道型墓葬構築，亦是成形於北魏而後傳至北齊、北周中心地區才進入長安；[250]以及墓葬陪葬陶瓷的種類和陳設位置等均源自北朝晚期等情形看來，隋唐陶瓷的發展與北朝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此外，經由與六世紀北方陶瓷的比較，亦可解決若干過去不明究竟的隋唐陶瓷裝飾內涵和淵源出自。如常見的隋代青瓷四繫罐罐身所飾被認爲是具有時代特徵的凸弦紋，其實只是北齊以來同式罐罐身的浮雕蓮瓣的簡化形式；而其中間的過渡樣式則可見於隋初開皇二年（582年）高潭夫婦出土的四繫罐罐身的類似波浪狀帶飾；[251]雖然亦有部份隋代四繫罐仍然保留著北齊樣式的浮雕蓮瓣裝飾。其次，近年來於陝西黃堡鎮唐代耀州窯窯址出土的黑釉盒或壺以刮釉刻劃露出器胎、弦紋或花卉的技法

247. 不過洛陽地區曾出土隋和初唐施草綠、醬黃色混合釉彩的紅陶。參見：洛陽博物館，《洛陽唐三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3。然詳情不明。
248.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西安郊區隋唐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66），圖版參捌之6。
249. 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安陽隋張盛墓發掘記＞，《考古》，1959年10期，圖版玖。
250. 傅熹年，＜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構造和所反映的地上宮室＞，《文物與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32。
251. 河北省文管處（何直剛），同註58，頁30圖四一。

臺灣大學博物館 期刊資料庫

,[252]則可見於洛陽北魏大市遺址的模倣西方玻璃器裝飾意匠的黑釉碗和缽（同圖57）。後者是中國陶瓷史上首次出現的以刮釉露胎方式來營造呈色不同的胎和釉之對比效果。倣爲陸羽《茶經》唐代六大名窯之一的安徽壽州窯作品的所謂漏花印紋，[253]或著名的宋代磁州窯黑釉剔花作品，基本上也是屬於同一概念下的產物；後者同時又與銀器上以鏤金來突顯主題的意匠不謀而合。

五、結語

總結以上敘述，不難看出東漢以後鉛釉陶雖趨衰微，但仍持續生產。相對於曹魏墓鉛釉作品種類基本承襲漢代，至西晉時則產生了較大的變化，除了少數墓葬之外，該時期一般不見流行於漢代的明器模型和俑類，釉色亦以紅褐色系釉佔絕大多數。十六國時期中原地區鉛釉陶消息頗不明朗，但於高句麗墓葬遺跡則經常可見，此後要到北魏中期偏後的五世紀後半再度復甦，並於北齊時達到了最高峰，與北方高溫瓷器並駕齊驅，是當時人們喜愛的用器之一。魏晉鉛釉陶的存在，既可修正過去部分研究者所主張漢代以後北方鉛釉陶已經消失的看法，亦可爲流傳於世的該一時期鉛釉陶提供判別年代或大致產地的可靠依據，使定年混亂的傳世作品找到應有的歸宿。[254]其次，洛陽等地晉墓出土南方青瓷不僅反映了南北兩地的交往以及北方地區對於高溫瓷器的愛好，也使得過去有學者認爲中原地區魏晉墓幾乎沒有發現瓷器的觀點[255]得到必要的澄清。有關北方青瓷的起源至今不明。雖然六世紀二十年代前後北魏晚期墓出土了較多青瓷，其中並存在若干細部造型特徵與目前所見南方青瓷同類器有別的作品，清代文獻亦有元魏時燒造供御的關中窯或洛京陶的記載，[256]但若從同一時期出土陶器的造型作風進行間接的主觀臆測，其仍有可能來自南方。由於南方窯址發掘未臻全面，故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解決。北方窯業於東魏、北齊時有了較大的發展，隋唐陶瓷主要承襲了該一燒瓷傳統並將之發揚光大，而南朝陶瓷則是六世紀北方陶瓷的重要範例之一。陳寅恪先生曾經指出隋唐制度不外乎出於北魏、北齊，梁、陳，以及西魏、北周等三源，[257]就目前的考古資料

252.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黃堡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彩版三五；圖版四五之2。
253. 胡悅謙，同註213，頁746圖九之4。
254. 如三上次男於《陶器講座》（同註94，圖31）揭示的所謂漢代紅褐釉壺。類似造型的西晉陶器於洛陽第20號墓（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二隊（蔣若是等），同註22，頁178圖九之4）或河北滄州市郊墓（王世杰，＜河北滄州市郊劉胖莊西晉墓＞，《文物春秋》，1989年3期，頁84圖3），都可見到，無疑是北方西晉時期流行的鉛釉陶。另外，將該一時期作品誤認成北魏鉛釉陶的例子，見前引《北京歷史文化展》（同註11，圖15）。
255. 如李輝柄，＜略談我國青瓷的出現及其發展＞，《文物》，1981年10期，頁50。
256. 藍浦，《景德鎮陶錄》，卷7，關中窯條：元魏所燒，出關中，即今西安府咸陽等處，陶以供御；洛京陶條：亦元魏燒造，即今河南洛陽縣也，初都雲中後遷都此，故亦曰洛京，所陶皆御物。
257.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台北：里仁出版社版，1981），頁1～2。

看來，隋唐陶瓷的因襲確有與半世紀前陳氏所做論斷相符合者，而以北魏、東魏、北齊的影響最爲直接，並反映在葬儀制度和殉葬陶瓷的組合等各方面。在驚訝史家洞察先機的史觀之餘，不禁讓人再次深刻的體會到陶瓷史與歷史傳承之間的緊密連繫。事實上，魏晉十六國北朝墓出土陶瓷亦在某種程度上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文化及其歷史背景。魏晉墓出土殉葬陶器遽然減少，或與當時北方戰亂產業蕭條不無關聯；而曹操出身寒族以法術治世，推行薄葬之風亦可能對當時葬俗有所影響。[258]尤可注意的是約從三國西晉開始，除若干邊遠地區仍採行東漢後期多室墓舊制外，許多等級極高的貴族墓往往變成單室墓，出現了所謂「晉制」；[259]出土陶瓷正與該一時代趨勢有吻合之處。其次，就如前人所指出從北魏司馬金龍夫婦墓出土文物看來，在孝文帝改制以前已有明顯的漢化跡象，[260]不過該墓陶牲畜成群，卻未見有與庖廚有關的其他明器，則又說明了平城時期北魏統治層仍保存一部分的畜牧經濟，[261]至於同墓出土的南方青瓷亦反映了墓主對於南朝文物的喜好。儘管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南北關係緊張，史料上看不到南北通好的記錄，[262]不過北魏遷都後墓葬出土南方青瓷數量、種類明顯增多，出土分布也有擴大，雖然不能排除由民間走私的可能性，但出土陶瓷既可彌補文獻的不足，亦反映了漢化已成定局並逐步地加深；洛陽大市遺址出土的倣西方工藝品的陶瓷更是東西文化交流的見證。此外，六世紀北方施釉陶瓷造型多倣自南朝青瓷，同時期的無釉陶器多爲北方傳統器形一事，似乎就是當時漢化政策與傳統土著勢力消長和矛盾的政治縮影，施釉陶瓷數量雖較少，然而卻是時代的主流。不過探討這一時期陶瓷史所透露出的文化訊息無疑必需結合墓制的變化和出土陶瓷的整體組合變遷，兼顧各地區的不同條件因素才有可能達成。就這點而言，本文或可說是今後探討該一課題事先應做的材料準備罷了。

258. 魏晉葬俗概況可參見：上村幸次，＜三國時代喪葬禮俗私考＞，《大谷學報》，17卷2期（1936），頁137～48；魏鳴，＜魏晉薄葬考論＞，《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4期（1986），頁133～43。
259. 俞偉超，＜漢代諸王與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論“周制”、“漢制”與“晉制”的三階段性＞，《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332～37。
260.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等，同註49，頁28。
261. 宿白，＜盛樂、平城一帶的拓跋鮮卑－－.北魏遺迹－－鮮卑遺迹輯錄之二＞，《文物》，1977年11期，頁44。
262. 蕭黎，＜北魏孝文帝時期之南北關係＞，《北方論叢》，1986年5期，頁79～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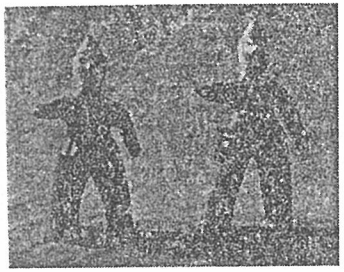


圖1　西晉　《鉛釉陶俑》，北京景王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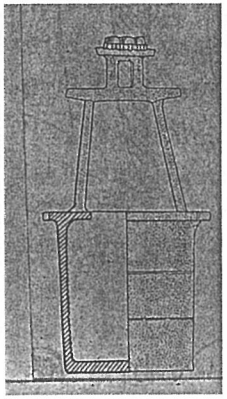


圖2　曹魏　《鉛釉陶井》
陝西華陰縣1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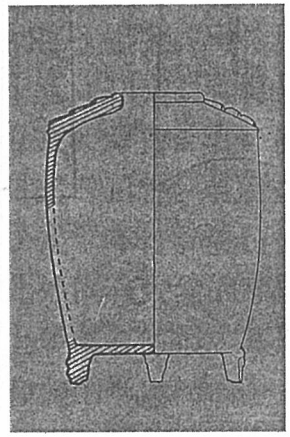


圖3　曹魏　《鉛釉陶倉》　陝西華陰縣1號墓



圖4　西晉　《綠釉小罐》
遼寧遼陽三道壕8號墓



圖5　西晉　《綠釉小罐》
遼寧遼陽三道壕8號墓



圖6　西晉　《綠釉小罐》
甘肅嘉峪關魏浦大隊11號墓



圖7　西晉　《綠釉小罐》　洛陽晉墓



圖8　西晉　《綠釉小罐》
宜興元康七年周處墓



圖9　西晉　《綠釉小罐》　南京象山王廙墓



圖10　十六國　《黃綠釉壺》
遼寧北燕太平七年馮素弗墓



圖11　北魏　《綠釉白彩俑》
山西太和八年司馬金龍墓



圖12　北魏　《黃褐釉陶罐》
山西大同張女墳110號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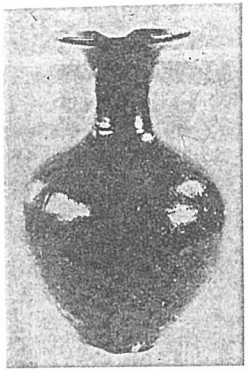


圖13　北魏　《醬釉長頸壺》
山西大同張女墳114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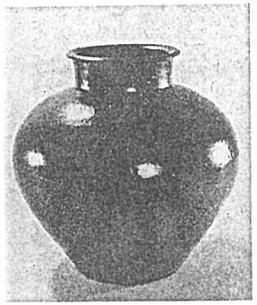


圖14　東魏　《黑褐釉壺》
河北天平四年高雅夫婦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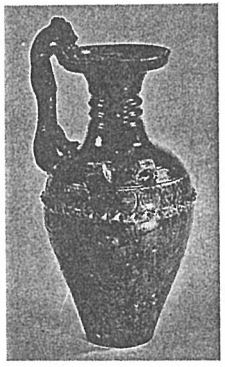


圖15　東魏　《黃褐釉獸柄盤口壺》
河北天平四年高雅夫婦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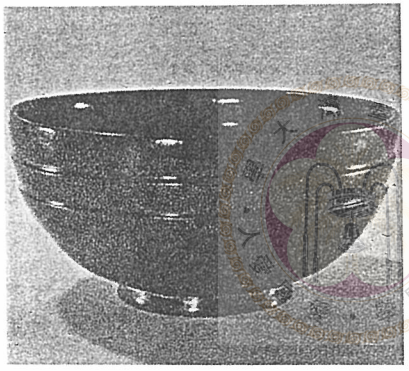


圖16　東魏　《醬釉弦紋碗》
河北天平四年高雅夫婦墓



圖17　東魏　《黃褐釉盤口壺》
山東興和三年房悅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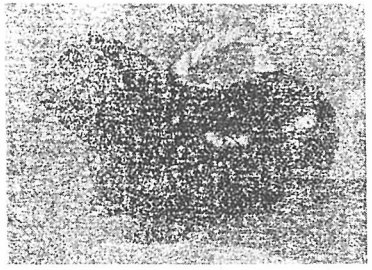


圖18　東魏　《褐釉虎子》
山東興和三年房悅墓



圖19　北齊　《黃釉蓮花尊》
山西河清元年庫狄洛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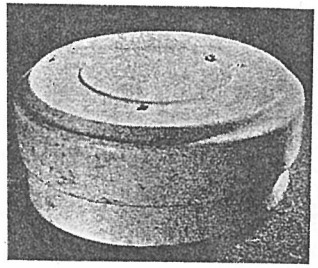


圖20　北齊　《黃釉盝盒》
山西河清元年庫狄洛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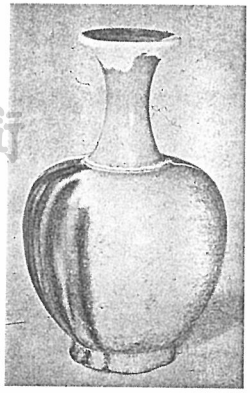


圖21　北齊　《白釉綠彩長頸瓶》
河南武平六年范粹墓



圖22　北齊　《黃釉綠彩四繫罐》
河南武平六年范粹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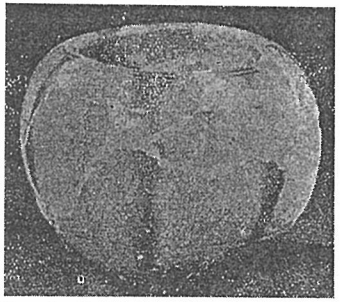


圖23　北齊　《二彩盂》　山西武平元年婁叡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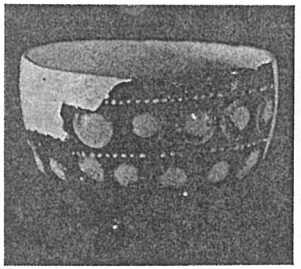


圖24　北魏　《釉下彩陶碗》
洛陽城北魏大市遺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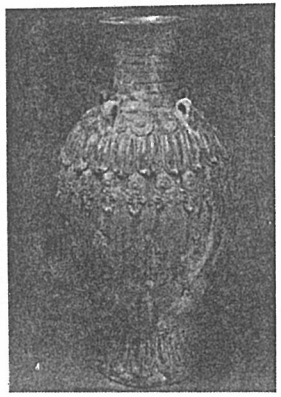


圖25　北齊　《黃褐釉蓮花尊》
山東淄博和莊北齊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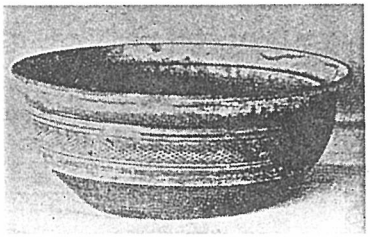


圖26　西晉　《青瓷印紋洗》
河南信陽擂鼓台墓



圖27　西晉　《青瓷盤口壺》
河南信陽擂鼓台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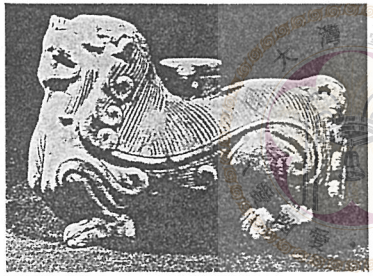


圖28　西晉　《青瓷獅形器》
山東北魏太和十七年崔猶墓



圖29　西晉　《青瓷蓋罐》　河北石家莊市



圖30　《青釉蟾座燈台》
河南北魏孝昌二年華榮墓



圖31　《青瓷鵝頭壺》
河南偃師聯體磚廠北魏2號墓



圖32　《青瓷蓮花瓣紋碗》
河南偃師聯體磚廠北魏2號墓



圖33　《青瓷鵝頭壺》
山西北魏神龜二年辛祥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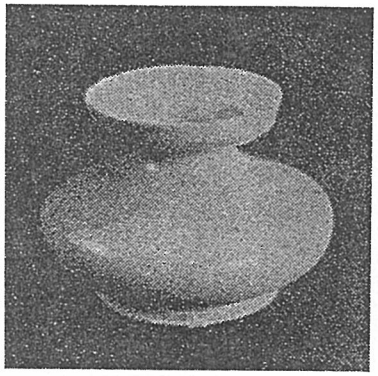


圖34　《青瓷唾壺》
陝西北魏熙平二年楊舒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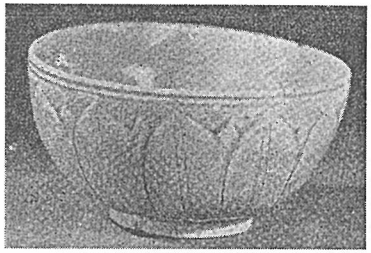


圖35　南朝　《青瓷蓮花瓣紋碗》
江西南齊永明十一年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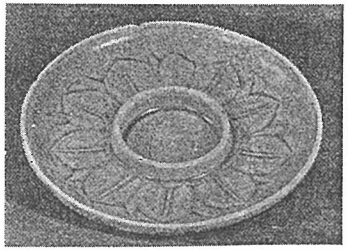


圖36　南朝　《青瓷蓮花瓣紋托盤》
江西南齊永明十一年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7 《青瓷六繫蓋罐》
河北東魏封柔夫婦墓



圖38 《青瓷盤口四繫壺》
河北東魏封柔夫婦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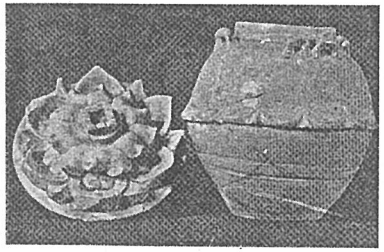


圖39 《青瓷蓮瓣紋蓋罐》
河北東魏武定八年茹茹公主墓



圖40 《青瓷蓋罐》
山東東魏元象元年崔混墓



圖41 《青瓷四繫罐》
山東東魏武定二年賈思伯夫婦墓



圖42 《素燒瓷雙繫蓋罐》
山東北魏太和十七年崔猶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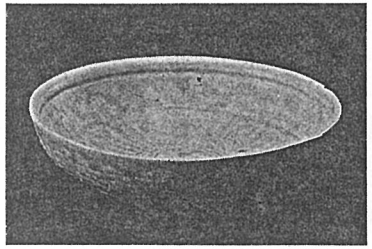


圖43 北周 《印花青瓷碟》
陝西咸陽國際機場北周墓



圖44 北齊 《劃花紋青瓷罐》
河南武平七年李雲墓



圖45 《青瓷蓮花尊》
河北北齊河清四年封子繪墓



圖46 北齊 《青瓷蓮瓣紋罐》
河北天統二年崔昂墓



圖47 北齊 《青瓷唾壺》
河北天統二年崔昂墓



圖48 北齊 《青瓷碗》
河北天統二年崔昂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9　北齊　《青瓷鶴頭壺》
山西天統三年韓裔墓



圖50　北齊　《青瓷貼花壺》
山西武平元年婁叡墓



圖51　北齊　《青瓷鶴頭壺》
山西武平元年婁叡墓



圖52　北齊　《青瓷托杯》
山西武平元年婁叡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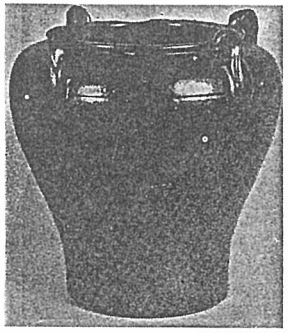


圖53　北齊　《黑褐釉帶繫罐》
河北天統二年崔昂墓



圖54　東魏　《黑褐釉帶繫罐》
河北武定五年趙胡仁墓



圖55　北魏　《獸柄盤口陶壺》（把殘）
山西永平元年元淑夫婦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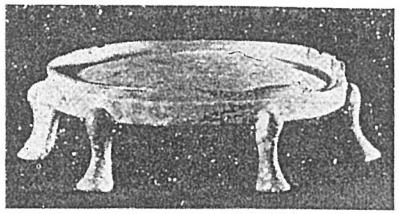


圖56　北魏　《六足陶硯》
山西永平元年元淑夫婦墓



圖57　北魏　《黑釉碗》　洛陽城北魏大市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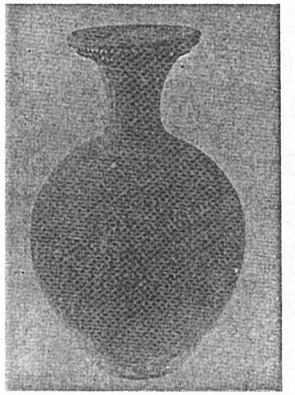


圖58　北魏　《盤口細頸陶壺》
山西大同城南北魏1號墓



圖59　北齊　《青釉燈台》
山西武平元年婁叡墓



圖60　北魏　《短頸陶壺》
山西大同南郊北魏134號墓

臺灣大學 期刊資料庫